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1976

柳詒泉
一九七五



毛主席语录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

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六年第六期 目 录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短评：学习理论 深入批邓..... (3)
- 要哪个阶级的自由？
——兼评邓小平的世界观..... 齐永红 (4)
- 评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攻势..... 红 宣 (9)
- 邓小平与《二十条》..... 宫效闻 (14)
- 革命委员会好
——上海良工阀门厂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20)
- 杂 文 尾巴、《水浒》及其他..... 文 波 (26)
- 文 邓小平的语言学..... 季 尚 (27)

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 走资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 庄 岚 (29)
- 列宁是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 翟 海 范 贻 (33)
- 漫话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 石隶实 曹思峰 (37)
- 从井冈山的官兵关系说起 施东晖 (43)

经济问题研究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

——赞三十万瓩汽轮发电机组胜利发电 金盛曦 (45)

在一个县委书记的身边 袁夏良 (49)

为城市人民多养鱼

——嘉定县城东公社水产队的调查

..... 《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编写小组 (58)

计划·价格·思想工作

——蔬菜购销工作札记 上海市蔬菜公司
杨家桥购销站 做价员 杨计法 梅国庆 (61)

文 艺 评 论

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喜尝试

——话剧《盛大的节日》笔谈会 (64)

路 沈逸珍 徐国芬 (73)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学习理论 深入批邓

短评

怎样进一步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引向深入？关键在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反动。他大刮右倾翻案风，正是从反对和攻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开始的。他用“三项指示为纲”来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指挥炮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文件和文章，要害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力图把商品交换原则贯彻到一切领域中去：在经济领域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在教育科技领域鼓吹读书做官、白专道路，在党的生活中鼓吹“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等等。如果依了邓小平的这一套去做，不消多少时间，商品交换原则统治和支配着整个社会，党和国家就要完全改变颜色了。

对于批邓斗争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我们要善于从理论上给予正确的说明。为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焦点？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党内出现走资派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党内走资派是怎样产生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铲除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的土壤？怎样进一步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搞清楚这一系列问题，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学习理论和深入批邓结合起来。

批邓可以也必须联系全国和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实际。联系实际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各项工作中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端正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继续搞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的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要哪个阶级的自由？

——兼评邓小平的世界观

齐永红

毛主席最近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党内走资派中有许多人，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演变而来的。剖析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的演变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

邓小平所走的，就是一条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党内走资派的道路。他虽然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投奔了革命，但由于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于党的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是根本不愿接受的。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一月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新民主主义论》）时隔一年之后，邓小平却公然提出：“在战胜日寇之后，我们还必须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力量，建设中国成为真正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请看，在邓小平的纲领中，第一，毛主席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不见了；第二，“在第一阶段上”这六个字被勾销了；第三，“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中的“革命”二字也被抹掉了。可见，邓小平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搞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他所讲的“真正独立自由幸福”，也就只能是如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的‘自由’实际上是富人的自由”。（《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自由”，这是资产阶级喊了几百年的口号。资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腹中孕育起来的。但资本主义一旦来

到人间，就迫切要求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建立保证资产阶级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地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喊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对封建特权进行了挑战。这个口号在当时虽然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它始终是一个维护资产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他们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要求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进行商品交换的自由。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叫喊“自由”的阶级实质。

资产阶级民主派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这个政治派别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由”的高谈阔论。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立场时曾经愤怒地声明：“谁要是大谈一般‘自由’，谁要是为了这种自由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帮助剥削者，谁就是拥护剥削者”。（《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邓小平就是列宁愤怒斥责过的那种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追随彭德怀唱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滥调，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弹资产阶级的“自由”口号，并且利用手中权力去搞那个梦寐以求的“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地要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分道扬镳，变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政治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停顿了他的脚步。这是由于他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列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全国解放后不久，邓小平就追随刘少奇鼓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纲领，提出“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要求实施土地买卖、雇工剥削、借贷和贸易的“四大自由”。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发展城乡资本主义。所谓“四大自由”，就是根本不准触动私有制，竭力保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本不准让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转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总结了建国初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新鲜经验，揭示了从资产阶级民

主义到修正主义的演变过程。邓小平大搞“四大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深刻地表明，资产阶级民主派若不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抛弃原来的世界观，就必然在社会主义时期搞右倾机会主义，搞修正主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就会“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性质：他们是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的，他们捍卫自由事业是不彻底的和抱有自私的目的。”（列宁：《无产阶级在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在窃取政权》）邓小平伙同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一刀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又多次攻击人民公社运动“步子迈得太快了”，念念不忘那个“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叫嚷要“恢复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这一系列丑恶表演进一步暴露了邓小平要的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

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雄伟步伐，打破了邓小平的自由美梦。但他决不肯死心，一有机会就要搞复辟。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政治上的顽强表现。在我国遭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邓小平又一次破门而出，继续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谬论。邓小平在一九六一年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所谓不管白猫黑猫，就是不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马列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邓小平在一九六二年七月说的一番话，对“白猫黑猫”论作了一个绝妙的注脚。他说：“看来，生产关系什么形式为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那种形式在那个地方容易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说穿了，就是提倡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邓小平打着增产粮食的幌子，鼓吹单干，就是要在个体农民已经基本摆脱小商品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大力扶植小商品生产，搞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一发展，就会进一步要求粮食买卖的自由，投机的自由，少数人发财的自由。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说过：“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可见，邓小平提倡的自由竞争，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真是反动透顶。

邓小平的“自由”论，反映在分配关系方面就是要竭力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统治地位，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代替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带着“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入了党，在民主革命中做了一点工作，就以为积聚了一笔资本，一有机会就会向党讨价还价。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就公开说过：“老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嘛。”仿佛无产阶级不按劳(包括功劳、苦劳、疲劳)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便亏了理似的。这是哪一家的“理”呢？连人的经历都成了商品的牌价，把入党，把为革命做点工作，看作是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等级的阶梯，这就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原则的妙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不是商品的东西，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拿去交换货币，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的形态。”在邓小平看来，通过商品交换的渠道，把功劳、苦劳、疲劳转化为商品的形态，向党和人民卖高价，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原来，他参加民主革命，并不是为了工人、农民的解放而斗争，而只是为了把自己化作昂贵的商品向党交换特级待遇。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邓小平为了自己一类修正主义“大官”们的“满意而舒服”，要在共产党内搞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自由，要求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自由，彻底暴露了党内走资派妄图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的狼子野心。

邓小平的“四大自由”论、“白猫黑猫”论、“功劳、苦劳、疲劳”论，都是来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来自灵魂深处那个资产阶级王国。他身子在共产党内，心向着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就必然推行一条保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邓小平从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滑向修正主义的必然过程。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诵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原则立场上去”。(《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邓小平就是这样一类坚持资产阶级理论和原则的修正主义人物。他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参加了革命，又不肯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世界观，因而在民主革命时期屡犯机会主义错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则是坚持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邓小平坚持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苏修叛徒统治集团不是称赞邓小平是“真正的爱国者”吗？不是吹捧邓小平之流是“向着真正的自由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幸福前进”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竟然担心

中国没有“自由”，多么地仁慈和善良啊！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资产阶级便一个劲儿咒骂俄罗斯的大地上失去了自由。列宁当时愤怒地指出：西欧国家的“每一本书都说它们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现在法、英，这些西欧文明国家和美国都打着这面旗帜，‘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今日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自由”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同当年的国际资产阶级“‘为了自由’而反对布尔什维克”有什么两样呢？

邓小平的所谓“自由”，在国内赢得了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新老资产阶级的拍掌叫好。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中国为“秦皇的封建社会”吗？可见得他们二十几年来是多么的不自由！他们不是狂呼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要邓“当总理”吗？可见得他们是多么希望邓小平复辟成功而重新获得自由！但是，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此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决不会给任何阶级敌人以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自由。

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一场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我们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应当牢记列宁的教导：“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这一时代的口号必然是而且应当是：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情地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自由平等的偏见，同这些偏见作无情的斗争。”（《论意大利社会党党内的斗争》）邓小平的垮台，对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通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积极参加深入批邓的斗争实践，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断增强搞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永远做一个清醒的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道上奋勇前进！

评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攻势

红 宣

邓小平的翻案复辟活动，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

人们不禁要问：象邓小平这样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的大党阀，为何对文章、资料、刊物和戏剧、电影之类会表现出特别的热心呢？这个问题，不应当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去理解，只能从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中找答案。毛主席曾经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邓小平作为反革命阶级的总代表，就必然重视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

邓小平同无产阶级“争夺思想阵地”，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样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发动反革命舆论攻势的。

邓小平一旦重新工作，便急于星火地要搭舆论班子。早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他就约当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特别器重的那个“理论家”谈话，从国际问题谈到国内问题，十分投机。邓小平出了一连串的题目，扬言“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邓小平颇怀敬意地请那个“理论家”当“顾问”，鼓动他拿出当年挥笔的劲头来，写一批文章。还说：“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然后，他又诡秘地声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私下聘“顾问”，暗中搭“班子”，提出了“需要系统解答”的一连串大题目，怎么是“随便交换意见”呢？这里有鬼。鬼就鬼在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想搞一个得心应手的舆论班子，以便大造右倾翻案的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同毛主席亲自部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唱对台戏。

邓小平委托那个“理论家”招兵买马之后，便急于铸造炮弹打出去。他私下对自己的追随者倾吐衷曲：“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狂热地煽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情绪。果然，到了一九七五年七月上旬，邓小平就指使那个“理论家”，“收集一些关于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他在布置这个任务的时候，还恶毒攻击经过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的文化教育界“没有执行双百方针”，发泄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满腹怨恨。邓小平及其追随者戴着有色的放大镜，到处搜集“问题”，整理黑材料，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带来的“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团漆黑。一时间，反革命舆论飞沙走石，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仿佛没有邓小平一类“救世主”收拾残局，地球就要停止转动了。

邓小平发起的反革命舆论进攻是全面铺开的。他们施展出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炮制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在教育界，唆使一些人写诬告信，鼓动一些人游说演讲；在文艺界，集中目标攻击革命样板戏，为封、资、修文艺争地盘，甚至由那个“理论家”演出了请人写信、捉刀代笔的讼棍丑剧；在科技界炮制《汇报提纲》，在工交战线炮制《二十条》，在密室里炮制反革命文章；在社会上煽风点火，炮制和传播政治谣言。各种反革命舆论，按照“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定下的基调，组成了右倾翻案的大合唱。由于邓小平在八月六日就公然声称——“后台就是我”，他的追随者就到处扬言：“我这个话是有来头的！”那时候，他们是何等地欣喜若狂啊！

在我们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毒草就得批判，决不允许反革命舆论自由泛滥。正当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攻势越来越猖獗的时候，毛主席在八月十四日作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戳穿了宋江一类投降派搞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为全国人民提供了识别和批判当时正在猖狂进攻的右倾翻案风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短评，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阐述了评论《水浒》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于是，全国人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

心里一有鬼，就难免要丧魂落魄。邓小平十分害怕评论《水浒》会触及他的右倾翻案活动，又亲自披挂上阵，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阻挠——

一是贬低毛主席指示的重要意义。邓小平说，评《水浒》“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二是扑灭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的烈火。邓小平说：“现在，有些人听见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像要出什么事了。现在批宋江的投降主义，有些人就认为要搞什么运动了，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他甚至恶毒攻击评论《水浒》是有人借这个“做文章”，“搞阴谋”。

三是稳住右倾翻案派的阵脚。邓小平到处说：“你怕什么，又不是宋江、投降派。”

有了主子撑腰，邓小平的追随者也一个调门地散布流言蜚语。

有的说，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回去传达一下就行了”，根本不当一回事。

有的说，“《人民日报》评《水浒》的社论，中央也没讨论过”，当它假的。

有的说，“不要听《红旗》的”。

在邓小平的追随者中，那个“理论家”倒是相当敏感的，而且出自为主子保驾的真心。

对评论《水浒》特别留神。他通宵达旦地翻阅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并且大量摘录，从中窥测动向。有一次，那个“理论家”把报刊文章中论述宋江架空晁盖的话选抄了一部分，送给邓小平看。“理论家”说：“这显然是影射你，我说这决没有错。”邓小平一方面故作镇静地回答“不会”，一方面却恼羞成怒地翻阅起这些资料来。

请同志们注意，那个“理论家”为什么特别收集了“宋江架空晁盖的话”呢？这是因为，毛主席批判《水浒》“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强调了投降派从革命队伍内部篡改正确路线的危险性。宋江为了篡夺梁山革命事业的领导权，千方百计地架空晁盖，并且采用了“清君侧”的恶毒手法，排挤打击坚定执行晁盖的正确路线的革命将领。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就指出过：“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宋江就是这样一个人，邓小平也是这样的野心家。邓记谣言公司制造的反革命政治谣言，蛊惑人心，煽动分裂，矛头是直接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他们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诸如捏造罪名，嫁祸于人等等，妄图陷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广大革命人民揭露宋江架空晁盖的反革命策略，对当时正在猛刮右倾翻案风的邓小平之流是很不利的。这怎能不引起那个“理论家”的关注呢？

“理论家”说“宋江架空晁盖的话”是“影射”，邓小平说“不会”，这里反映了一主一仆的难言苦衷。是“影射”吗？不对。无产阶级从来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总是光明磊落地进行政治斗争。我们通过评论《水浒》揭露古代的投降派，是为了从中总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规律和经验，更好地对付现代的走资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评论《水浒》为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了思想准备。那个“理论家”用上“影射”二字，极好地说明了邓小平一伙的虚弱恐惧心理。人们总还记得，当年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发表的时候，曾在绅士、淑女等阔人之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他们人人自危，纷纷以为自己的“隐私”被鲁迅揭露了。其实，鲁迅哪里是在“影射”，不过是艺术概括的典型触到一些人的痛处罢了。绅士淑女们整日价担心鲁迅揭露了“隐私”，实在是他们有“隐私”怕别人揭露。那个“理论家”战战兢兢地向主子告密说有人搞“影射”，正说明“理论家”和他的主子确有“隐私”怕被别人捅了出来。很有意味的是，邓小平于解放初期在西南局任书记时，就曾演出过一出“宋江坐寨”的丑剧。他封这个是“豹子头林冲”，封那个是“大刀关胜”，说这个“黑旋风李逵”，说那个是“霹雳火秦明”，邓小平自己，则干脆以“及时雨宋江”自居。事实上，邓小平解放以来一直追随刘少奇合伙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重新工作以来又继续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确是现代的宋江。因此，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评《水浒》，批宋江，邓小平怎能不惶恐万状呢？那个“理论家”怎能不骂革命人民的批判是“影射”呢？

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革命舆论，是强大的，有力量的。全国人民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冲破了重重阻力，不断引向深入。但是，邓小平决不死心，继续加紧用反革命舆论对革命舆论实行反扑。

邓记谣言公司抛出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到处遭到了抵制和揭露，邓小平就倒打一耙。他别有用心地说：社会上的政治谣言“主要是报刊上发了评《水浒》文章引起的”。他妄图用这个话一箭双雕；一方面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评《水浒》的重要指示和革命人民评《水浒》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转移追查反革命谣言的目标，保自己经营的邓记谣言公司。

也正是这个时候，邓小平在密谋炮制两篇称得上所谓“拳头”的大文章。一篇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把“三项指示为纲”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阐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恶毒攻击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另一篇是关于评《水浒》的文章。前一篇由那个“理论家”组织班子写，后一篇则由“理论家”亲自执笔。那个“理论家”说：“我之所以要写评《水浒》的文章，是由于我不同意说现在党内还有投降派，还有宋江，有些文章说宋江架空晁盖，影射邓小平，我不赞成这种说法。”那个“理论家”为了向主子表白心迹，十分卖力。邓小平听了那个“理论家”的汇报后，连连称赞“很好”，并且亲切地鼓励说：“如果写得好，可送我，还可在《人民日报》发表。”那个“理论家”受宠若惊，一连写了二稿。

“作战总得要有阵地”，这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总结过的反革命经验。作为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挂帅人物的邓小平，是深知此中奥妙的。他多次催促那个“理论家”要“办一个综合性刊物”，而且一定要“办好”。

筹办刊物，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的重要决定。他在去年九月间听取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的汇报时说过：现在“刊物太少了”，并一再强调办刊物“是一件大事”。邓小平这样关心办刊物，缘由是很深的。有一次，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算一算“过去你们有多少刊物，现在有多少？”邓小平说出这个话，暴露了内心有着难言的隐痛。“过去”，当然是指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候，在刘少奇、邓小平把持的思想文化部门，资本主义泛滥，修正主义猖獗，牛鬼蛇神大量出笼，塞满了各种报纸和刊物。经过文化大革命，整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了受党内走资派保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批判了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了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对党内外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阵地是摧毁性的打击，邓小平哪肯干休？！这一笔账，他是非算不可的。所谓现在“刊物太少了”，就是邓小平“争夺思想阵地”的反革命动员令。

果然，经过一番紧张的谋画，邓小平之流准备在思想领域独树一帜了。去年十月六日，那个“理论家”公开宣布了邓小平的决定，要办一个全国性的大刊物。为什么要办这个刊物呢？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是因为“毛主席的指示在（现有的）刊物上得不到反映”。多么耸人听闻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支毒箭是有所指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恶毒攻击。要说“毛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的现象，确实是有过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刘、邓一伙控制的刊物。今天，邓小平之流造谣说“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要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搞一套，以便放肆地同《红旗》唱对台戏，其用心何其毒也！那个“理论家”谈

到这个大刊物的办刊宗旨时，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把它办成“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并且规定，这个大刊物要谈论的“不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全国都感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话表面上闪烁其词，实际的含义是：要代表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宣传“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要成为右倾翻案风的喉舌。不是吗？邓小平要追随者把办刊物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理论家”立即表示：“要把办好这个刊物当作头等重要的任务。”可见，邓小平之流对这个刊物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宣告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政治上的破产。邓小平一看势头不对，被迫转入了退却。去年十一月间，他对那个“理论家”说：你评《水浒》的文章写好后“不要送给我”；过了几天，又找那个“理论家”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几个走资派碰头统一口径，说：“你们跟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工作，不了解情况”；再过了几天，邓小平对自己的追随者说：“‘三项指示为纲’只是提法不妥。”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其罪恶滔天的翻案复辟行径。另一方面，邓小平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歪曲这场斗争的性质，继续用反革命舆论进行顽抗。今年春天，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节节胜利的时候，邓记谣言公司的政治谣言又大量抛入了市场。他们丧心病狂地伪造所谓“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中央文件”，伪造所谓“总理遗言”，伪造所谓“中央首长讲话”等等。这些政治谣言，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情节之离奇，手段之卑劣，流传之广泛，都是空前未有过的。直到在今年四月初，邓小平一手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说，狂呼反动口号，用反革命舆论配合反革命政治斗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产了，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攻势破产了。但是，邓小平的追随者私下里的一番黑话却发人深思。他们说：“如果让我们掌握全国的电台、报纸、刊物，只要半年时间就可以把整个局面翻过来。”这虽然是他们的痴心梦想，却也供出了邓小平之流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恶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的天下。

虽然邓小平从重新工作到垮台的时间不长，但他刮右倾翻案风的整个过程，都是十分注意造反革命舆论的。考察一下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攻势的始末，人们得到的教益是极为深刻的。它使我们懂得：我们在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决不可忽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决不可忽视舆论阵地。这些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牢固占领，党内外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都要注意并且去战胜资产阶级“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攻势，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向无产阶级最深刻、最强烈的反抗。邓小平的垮台，并不意味着这种反抗的停止。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把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邓小平与《二十条》

宫效闻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总要扯起骗人的幌子。所谓“一切为了现代化”，就是邓小平的一个幌子。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亡命之徒，也狂呼要由邓小平“主持工作”，来实现什么“四个现代化日”。仿佛中国少了这个邓“屠夫”，人们就注定要吃混毛猪了。

邓小平果真比任何人都要急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吗？这完全是假的！他亲自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二十条》），便完全暴露了这个右倾翻案风挂帅人物的狰狞面目。

《二十条》炮制过程长达半年，大改六次，小改三十二次。最有代表性的，有四稿：

八月十七日稿，共十四条；

八月二十二日稿，共二十条；

九月二日稿，共十八条；

十月二十五日稿，共二十条。

现在，就让我们分析一下这四个稿子的演变过程，看一看邓小平是如何有纲领、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的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说：

“现在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什么叫大局？三届人大报告，四届人大报告，都讲了，我们国家建设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〇年，第二步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五年。”

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四届人大闭幕不过一个多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报刊公开发表才过了十天。邓小平却迫不及待地提出，只有搞“建设”才是“全党”的“大局”，这决不是一时的失言。他的本意是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说成是无足轻重的“小局”。这是“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先声。他在这次讲话中的其他言论便是有力的旁证。

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说：“为什么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别的阶级专政呢？”“因为无产阶级是最有纪律，最有组织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竟然

被篡改成仅仅为了组织“现代化大生产”，这与资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区别呢？

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这句臭气熏天的“名言”的矛头所向，对一对它出笼的背景，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也是在这次讲话中，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说成是“闹得稀烂”，甚至以“工业情况不好”为由，拒绝同参加会议者拉手。为什么会“稀烂”？他根本无视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和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竟说是由于现在“没有章程，也没有纪律”。这就完全透露出邓小平要同党的纲领、路线对着干，搞一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章程的野心。

“风乍起，吹绿一池春水”。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大局”在胸，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紧。不久，他就公开亮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到了六月份，他又声称，一个一个解决问题还“不行”，“要在研究长远规划时通盘考虑一下”。

于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个修正主义的章程便应运而生了。

八月十七日，《二十条》的初稿送到邓小平手里，他连声赞“好”。第二天，即八月十八日，他急忙召开讨论会，吹捧“这个文件很重要”，“比十年规划纲要还重要”。

“重要”在哪里？就“重要”在它体现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全局”和“通盘考虑”，综合了邓小平重新工作以来几个月内一系列修正主义言论。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写进了“工作总纲”。邓小平攻击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文件也采取夸大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罗列一大堆所谓“纪律松弛”，“管理混乱”，“质量差，事故多”等等“阴暗面”。邓小平疯狂挥舞“整顿”的大棒，文件也是左一个“整顿”，右一个“整顿”，叫嚷“笼统地批判‘管、卡、压’，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文件如此忠实地记录并阐发了邓小平的反动意图，邓小平又怎么能不笑逐颜开地叫“好”呢！

在八月十八日的讨论会上，邓小平又用“积重难返”四个字，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进行了更为恶毒的诬蔑。问题既然越说越严重，文件自然也要随之加温升调了。他发了一大通议论，提出要在文件上加上去。

于是，就有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二稿和九月二日的第三稿。

二

前后三稿，补充了哪些邓小平认为“还没有提出来”的问题呢？

一是加了一条“党的领导”。标题冠冕堂皇，可是一看内容，不对了。这一条开宗明义提出，能不能认真贯彻落实三项指示为纲，“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这确实是我们理解这个条目的“关键”。抓住了这个“关键”，什么要“敢于领导、敢于负责”呀，什么反对“软、懒、散”，“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呀，就都有了着落，所谓“整顿”，也一清二楚了——

“经过整顿，要改变那些‘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什么“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据说，这些人“指手划脚，一味整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

一类帽子”。好，“复旧”、“倒退”，居然都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谁要动一动，就得被扣上“整人”一类的“帽子”。但这些语言我们并不陌生。当年胡风就曾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整人”，资产阶级右派也曾谩骂共产党“唱高调”，你们居然也那样说，不是说明你们原是一丘之貉吗？

什么“坏人”？据说这是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专门“打击、陷害好的革命干部和工人，搞资产阶级专政，搞复辟倒退”。这里的“革命干部和工人”，就是邓小平所谓的被每次运动“伤害”的“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你们要把被历次运动打倒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说成是“革命”的，自然非得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说成是“右派”不可。要把“权力夺回来”？这不就透露了你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杀机吗？

这还不够，最后还写上“背后有人支持”。“背后”是谁？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呢？

邓小平很善于创造新名词。这里的“勇敢分子”、“小知识分子”、“右派”及其“后台”之类，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那篇黑文中，叫做“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暴徒们，更是恶毒地称作“一小撮野心家”。用语不同，含义是一样的，指的都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图穷匕首见。打开这幅以“四个现代化”为题的黑图，原来就隐藏着邓“屠夫”妄图架在革命人民头上的屠刀！

邓小平曾经说：“整顿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领导班子要整顿。”文件中的这一段文字，就是体现邓小平朝思暮想的这个“核心问题”的。这就是要通过篡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领导权问题，警惕党内走资派以各种形式篡夺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是加了一条“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什么要突出这一条呢？邓小平在八月十八日的会上说：“有些问题没有提出来，如按劳分配，是不是不到时机？”“不提按劳分配，我总是放不下心”，还说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转脑筋”，“文件要琢磨一下”。

奇怪，“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分配原则，在文件中列不列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一个“是不是不到时机”的问题呢？原来，他在三月份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之后，到了六月份，他在上海又说：“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八月十八日，他还说：“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现在计件（工资）有的地方还在搞，但不敢讲，不合法。”这就清楚了。他要“提出”按劳分配的问题，是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翻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案。

邓小平一声令下，修改稿立即大书特书：

“在社会主义时期，它（按劳分配）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执行。”

这一条的特点是写得非常“全面”：“这一方面”，“那一方面”，“既反对物质刺激”，“也反对平均主义”，等等。但是一涉及关键问题，就不那么“全面”了。这里就只许讲“基本适合”“这一面”，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是旧社会痕迹的论断，按劳分配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思想，对不起，这是没有资格写进条文的。

你要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和批判吗？文件就称为“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还给你扣上一顶“搞平均主义”的大帽子。好一副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的嘴脸！

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的命根子。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当然特别反感，当然要“放不下心”，做梦也在“转脑筋”。不过，邓小平的那套连多劳多得本来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也不懂的荒谬言论，是难以公开见之于文字的，所以就需“琢磨”一下。“琢磨”的结果，就是修改稿中那段模棱两可、典型折中主义的条文。但是，不难看出，条文里打着反对所谓“平均主义”的幌子，片面强调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正是表明他们讲“按劳分配”只是个幌子，企图实行按权力和资本大小进行分配才是真的。邓小平以为这样一写，就可以放心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复辟倒退了，然而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

三是加了一条所谓“增加工矿产品出口”。这也是邓小平在八月十八日的讨论会上提出来的。他说：“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

这里提出的，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中进出口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搞四个现代化究竟“靠”什么的问题。照邓小平的说法，只有“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才“最可靠”，只有“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才“最可靠”，那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岂不一概都“靠”不住了吗？“靠”这样的“大政策”，非但搞不了什么四个现代化，而且只能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列宁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走资派妄图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和国际上的帝、修、反串通一气，相互呼应。这个“大政策”一下子就剥掉了邓小平所谓“爱国爱民”的画皮。他们不仅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且要推翻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成果，使我国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一切革命的人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

前后三稿，在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一稿比一稿更具体、更完备了，那股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气焰，也一稿比一稿更疯狂、更嚣张了。

三

一九七五年十月，这个已经修改了好几稿的《二十条》送到了被邓小平倚为“顾问”的那个“理论家”的手中，他却煞有介事地说这几稿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办工业思想体现不够”，“无论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都不通”。

怎样“体现”毛主席办工业的思想呢？“理论家”于十月二十五日抛出了一个稿子，洋洋三万字，篇幅比过去各稿要长一倍以上。在第一条“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办工业路线”的标题下，一共选用了毛主席有关工业问题的语录六十六条。与那位“理论家”在九月份炮制的那份《科学院汇报提纲》中的十条相比，标题措辞完全一样，似乎很有点象他们自己说的“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那些语言”的样子了。

但是，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卑鄙用心，

在引用的那么多语录中，偏偏不选一条毛主席有关党的基本路线、有关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录。你们口口声声“全面贯彻”，是不是觉得把这些指示写了进去，就不“全面”了呢？

在引用的那么多语录中，偏偏不选一条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工厂企业斗、批、改中大量涌现的新鲜经验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你们口口声声要写“文化大革命的语言”，为什么这些重要的话偏偏那么怕写进去呢？

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作过重要的指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就在不久前召开的四届人大上，又重申了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你们怎么偏偏又忘记了呢？

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段指示，击中了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要害。他们既然如此疯狂地企图篡夺企业的领导权，又如此热衷于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路线，又怎么能够选用毛主席这一条指示呢？那岂不是要把自己置于死地吗？编选毛主席语录，同时又竭力加以歪曲，以便更加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正是党内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惯用伎俩，现在不过是在新编《二十条》中作了又一次充分的表演罢了！

那个“理论家”不是要讲“辩证法”吗？列宁说得好：“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国家与革命》）“理论家”的“辩证法”，也不过是新老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而已。

在新文本里，邓小平的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忽然不见了。这个纲领，在前几稿中被称为“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直重要之极，为什么经过“理论家”大笔一挥，就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偃旗息鼓了呢？可不要以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真的已经开始改悔，不搞修正主义了。“三项指示为纲”从前台消失了，却又从后门塞了进来。在删去“工作总纲”、说了一通“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之类的话以后，在最后一个条目“全党动员，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而奋斗”中，却写上了“三项指示”“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必须全面贯彻执行”的老调。这不是在玩弄“原则保留，棱角磨掉”的障眼法吗？至于说“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也不过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兜售修正主义的挡箭牌。在修改稿中，这是作为整整一个条目列出来的，当然是很庄严的了。但是，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哪里呢？文件说：

“少数企业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请看，这些语言，同前两稿不是完全一样吗？在这里，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依然被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他们用“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这一类更加恶毒的语言，妄图把起来揭露和批判邓小平搞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一棍子打下去。所不同的是，这里加上

了“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的幌子。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些改变，是由于随着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的深入，邓小平预感到“大势不好”，迫切需要给自己的修正主义货色披上某种伪装。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这种伎俩又能骗得了多少人呢？

四

按照邓小平的预定计划，经过“理论家”修饰以后的《二十条》本来是要在十月底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正式抛出来讨论的。但是，随着右倾翻案风的濒临破产，这份东西改到第六稿的时候再也改不下去了，终于成了一份失败的记录，未出娘胎就宣告夭折。

值得着重提出的是：《二十条》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只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邓小平主持制订的那个《工业七十条》找出来一对照，就大有似曾相识之感。人们都还记得，十五年以前，广大工人和干部迫切需要有一个在总结三年大跃进经验的基础上，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的工业条例。而邓小平作为刘少奇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帮凶，却利用他主持这项工作的机会，把一整套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塞进了这个条例。因此，在试行的时候，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许多企业干部和工人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工人和干部的批判。正是在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下，一九六八年，邓小平不得不承认：“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一九七二年八月，邓小平又再一次检查说：“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毛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可是，这些话都靠不住。他一旦重新工作，立刻翻脸不认帐。去年八、九月，他几次讲到了《七十条》。一次他说：“工业也有个条例（指《七十条》），是要修改，不是废除。”再一次又说：“工业七十条还是好的，还可以用，中央又没有废除它。”但是，把已被批判过的东西重新拿来推行，究竟不那么容易，因此，得找一个新形式，那就是以“加快工业发展”为名的《二十条》。

《二十条》，完全是十五年前的《七十条》在新形势下的翻版。邓小平自己就不打自招地说过，这个文件“基本上是代替过去工业七十条的”。一点不假。《七十条》是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案，《二十条》是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两个文件的矛头都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只要认真分析一下邓小平主持制订的《七十条》和《二十条》，就可以充分认识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不是如他自卖自夸的是一个热心四个现代化的行家里手，而是一个闹右倾翻案、搞修正主义的老手。

前后六个稿子，头尾半年时间。这个修正主义的条例，象一时泛起的沉渣，很快又沉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了。从《七十条》到《二十条》，从反面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炮制的《二十条》确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革命委员会好

——上海良工阀门厂的调查报告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国亿万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向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产物。毛主席赞扬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生事物越来越显示出生气勃勃的强大的生命力。

上海良工阀门厂革命委员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建立的。九年来，它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带领全厂八百多名工人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全厂逐步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革命推动了生产建设的巨大发展。一九七五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这个以生产高中压阀门为主的工厂，产品产量增长了二点七八倍，总产值增长了二点四九倍，上交利润增长了二点二五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点四六倍，品种从四十种发展到二百五十多种。就生产能力来说，现在的一个良工厂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三个半良工厂。实践证明，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委员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这对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破坏和扼杀革命委员会的反动行径，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工人当家作主的重要组织保证

毛主席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毛主席的这一论断完全正确。文化大革命前，良工阀门厂的基础也是不稳固的，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影响下，厂领导搞什么“一长制”、“专家治厂”、“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使企业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文化大革命中，工人群众奋起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人群众的代表直接参加权力机构，这对于工人阶级掌握工厂企业的领导权，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重要的组织保证。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的领导班子严重不纯。五名正副厂长中，有二名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十六名正副科长中，有七名是资本

家、资本家代理人 and 坏分子。现在，厂革命委员会的二十九名委员，除了五名老干部外，工人代表二十四人，占百分之八十三。其中工人女委员六人，非党群众代表十二名，不脱产委员九人。五名正副主任中，工人代表三人。一大批生产第一线的优秀工人参加到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中来，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了工人阶级对企业的领导权。工人同志高兴地说：“革命委员会好就好在有我们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当家又作主，人换思想厂变貌。”

工人群众代表直接来自生产第一线，对群众的要求、呼声最清楚。他们参加革命委员会以来，经常反映群众的意见，坚持把好路线关，使厂里的各级领导班子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的领导班子虽然大部分都是好人，但是他们跟着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走，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看不到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动不动就搞“管、卡、压”，使领导与群众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现在，工人群众代表参加了领导工作，对厂里的各级领导班子实行直接的革命监督，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有一段时间，一车间有几个班组一度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影响工作和生产。开始，个别干部认为，这主要是制度不严，管理太松，主张搞几条规章制度刹一刹，整一整。后来，把这个问题拿到厂革委会会议上一讨论，引起了激烈争论。有的说，这个意见可以考虑嘛！但是大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们尖锐地指出，这表面看是劳动纪律问题，实际上背后有阶级斗争，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纲带目，才能改变面貌。厂革会经过调查研究和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发现确有坏人捣鬼，于是发动群众，揪出了一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通过这件事，深刻地教育了干部和群众，团结了大多数，使整个车间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生产很快就上去了。

厂革会坚持发动工人群众，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谬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识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能力，增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端正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个厂的阀门生产，主要的零部件过去都靠砂模造型，毛坯件肥头大耳，象只面拖蟹，一年生产三千吨阀门，机械加工切削下来的铁屑就有一千多吨。工人同志说：“剥了三层皮，才见真阀体，汗水流在铁屑里。”他们早就要求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手段。厂革会经过充分发动群众讨论研究，决定搞精密浇铸新工艺。但是，在怎样实现技术革新的问题上，厂革会内部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开始，个别领导干部主张等上级调拨设备，等兄弟单位支援技术人员，协作会战，结果等来等去，精密浇铸迟迟不能上马。后来，厂革会的干部下去听取群众意见，工人群众尖锐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打好阀门改造翻身仗。”厂革会虚心接受工人的意见，把“等”字换成“干”字，把依赖别人换成了依靠自己，发动群众迎着困难上，大胆

实践,反复试验,不断总结经验,只花半年时间,就搞成了精密浇铸新工艺。这件事生动说明,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不等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已经肃清了。工人同志说得好:“要看到走资派还在走,修正主义流毒还在流。”只有坚持革命大批判,把路线搞对头,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有效形式

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来,由于工人群众代表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这就显著地改善了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干群之间的关系,从这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由于受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修正主义黑货的影响,依靠少数人管理企业,重大问题往往都是厂长、专家说了算,工人根本无权过问。群众气愤地说:“以前厂长是厂长,工人是工人,界限清清爽爽,企业管理没有我们的份。”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厂革命委员会以后,工人代表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情况就不同了。厂革会遵照毛主席在“鞍钢宪法”中规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这几年来创造了不少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经验:凡是涉及全厂性的重大问题,交给群众反复讨论,听取群众的意见,然后再由革委会作出决定;厂革会定期召开扩大会,吸收工人群众参加,汇报工作,总结经验;经常组织群众运用“四大”武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找差距、学先进,帮助领导端正路线,改进工作;组织工人调查组,经常检查厂革会及其办事机构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情况,提出改进意见,等等。事实证明:只有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企业管理,让工人代表对工厂的重大问题有充分的发言权,才能保证工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使我们的工厂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轨道前进。去年初,四车间阀杆组的同志,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过程中,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提出要提前四个月完成全年任务。当时,个别领导没有从本质上看阀杆组工人群众学理论、当主人的革命精神,而是片面宣传他们的“提前”的口号,班组一度放松学习,走偏方向,去单纯追求生产指标,滋长了本位主义。这时,阀杆组工人同志贴出了“不当阀杆的奴隶,我们是工厂的主人”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讲生产“提前”,不讲学习理论,实际是“唯生产力论”的表现。厂革会热情支持阀杆组的大字报,并深入到这个小组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批评和意见,同时举一反三,多次召开厂革会的扩大会,进一步发动全厂工人群众揭露在企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在全厂迅速掀起了一个学理论,做主人,抓路线,促大干的群众运动热潮。

这个厂的革委会在依靠群众管理企业过程中,坚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正确处理干部和群众的相互关系。文化大革命前,厂里的不少干部自以为高工人一等,不平等待人,官气十足,对群众动辄训斥、扣奖金或者任意调动工作,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十分紧张,严重挫伤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厂革委会的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同工人一

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搞大批判，“生产三班倒，班班见领导”，群众见到干部感到很亲切。干部能随时随地听到群众的意见和反映，有了缺点和错误发现得快，改得也快，逐步形成了新型的干群关系。三车间涂料组一度革命，生产没有起色，团结搞得差，生产上不去。负责这个车间工作的一个厂革会委员就深入到这个班组，组织大家学习，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积极开展谈心活动，要求党员以身作则，鼓励和带动中间、后进群众进步。这样，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小组的精神面貌，许多同志抢挑重担，份内事拚命干，份外事抢着干，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的新气象。

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文化大革命前，良工阀门厂设有八科一室，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人批评这种现象说：“小小良工，机构臃肿。几个厂长，关门办公。既不下来，也不劳动。官气十足，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对原有的重叠机构实行了根本改革。

坚持精兵简政。厂革会遵照毛主席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的教导，打破了重叠的行政机构，从实际出发对原有科室进行了精简，改成了四组一室，使它更好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比如计划和采购过去分属两个科，很少通气，经常扯皮，有时采购跟不上生产需要，有时盲目采购，积压大量资金。现在通过精简合并在一个生产组里，及时通气，互相协作，克服了过去那种材料脱节和资金积压的现象。厂革会还不断从生产第一线吸收优秀工人，充实管理机构，逐步建立一支以工人为主体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对原来的科室人员，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向工人群众学习，改造世界观。不少科室人员经过锻炼和改造，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工人群众的欢迎。

坚持当好人民勤务员。厂革委会成员牢记毛主席关于“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教导，自觉当好人民的勤务员，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有一次厂革会负责抓生产的一个老干部，不和群众商量，关门制订了一个低于前一年实际水平的生产计划，根据是前方生产车间的设备和人员因支援内地建设减少了三分之一。厂革会中的工人群众代表知道这件事后，严肃地批评说：“关门拍脑袋，见物不见人，这样订计划同文化大革命前的做法有什么两样？”这位老干部接受了群众代表的批评，把计划重新交给全厂工人群众讨论，工人群众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们分析了因为设备和人数减少的不利因素，大算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笔大账，不仅提出了创造条件为国家多作贡献的口号，还提出了许多解决矛盾的措施。厂革会在群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一个生产水平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十的计划，经过广大群众努力奋斗，结果超额完成了。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厂的干部参加劳动很少，做

做样子，流于形式。现在，厂革命委员会委员认真坚持了参加劳动的制度。在厂革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每年劳动不少于一百天；车间革委会委员一般都做到不脱产。有一个厂革会委员兼任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工作很忙，但他手不离油污，身不离工作服。有一次，锻工组的一只炉子坏了，还未等炉子全部冷却下来，他就冒着炽热爬进炉膛进行抢修，保证了生产顺利进行。群众称赞他：“地位变了，工人阶级本色不变。象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革委会成员坚持参加劳动，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不仅有助于世界观的改造，同时能随时听到群众的呼声，及时解决革命和生产中碰到的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一车间大车组的劳动强度很高，工人要求搞技术革新的呼声很高，但当时的厂领导没有切身体会，根本听不进。厂革会成立以后，不少委员经常到大车组去顶班劳动，便有了切身体会，同工人群众想到一起去了。厂革会多次开会研究解决大车组的技术革新问题，发动广大群众自己动手，大搞技术改造，现在已为大车组配备了二台三头自动机床，五台电动轧头，不但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生产翻了几番。

坚持调查研究，转变领导作风。文化大革命前，厂里不少干部高高在上，成天坐办公室，往往主观作决定，想当然发号施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现在的厂革会委员，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调查研究中取得发言权，转变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四车间参加一项重点工程的会战项目，要在一年内完成五十台设备的配套任务，过了四个半月，却只完成一台。眼看任务不能按时完成，要影响大局，拖整个工程的后腿。这时厂革会就立即到这个车间调查研究，和群众一起分析原因，很快就抓住了症结所在：原来负责这项工作的个别干部，只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关起门来搞。厂领导就帮助这个车间的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大搞革新挖潜，自己动手造土设备，从而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了会战任务。

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使这个厂的领导班子密切联系群众，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工人同志们说：“我们厂的领导班子和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鱼儿沉在水里，自由自在，领导班子扎根群众，基础牢牢实实。”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

一九六九年七月，这个厂成立了新党委。当时有的同志认为：“党委会成立了，革委会可以‘靠边’了。”有的群众代表说：“这下我们的担子减轻了，历史任务完成了，好让位了。”针对这种思想，厂党委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委员会建设的一系列指示，使大家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革委会的权力机构作用，这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需要，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党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如果不注意发挥革委会的作用，把革委会丢在一边，事无巨细，什么都由党委一手包办，看起来是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包而不办，陷入事务主义，恰恰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挥革委会的作用是完全

一致的。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他们深有体会地说：“党委成立后，革委会的担子不是减轻了，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两副重担。”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领导主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良工阀门厂党委加强对革委会领导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组织党委和革委会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狠抓阶级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在斗争中提高广大干部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全厂的学习和批判，按照厂党委的统一部署，由党委和革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共同来抓。属于行政方面的日常的大量工作，都是由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布置实施。同时，革委会对重大问题经常向党委请示汇报，特别重大的事情提交党委、革委会两委班子会议集体讨论，不断增强革委会成员的党的观念，自觉接受党的领导。

第二，充分发挥革委会中群众代表的作用。对于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党委十分关心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给他们挑重担，放手让他们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发挥作用，增长才干。党组织通过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第三，重视发挥革委会中不脱产委员的作用。厂革会每月召开一、二次全委会，总结上月工作，研究和安排当月任务，遇到重大问题，还及时召开全委会讨论和处理。厂革会还经常召开不脱产委员的会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从政治思想上关心他们，定期组织他们轮流参加厂革会各组室的领导工作，上上下下，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和培养。

第四，在斗争中不断充实、加强革委会领导班子。这个厂的革委会成立以来，坚持老、中、青三结合，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注意把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人及时选拔和充实到革委会中来，增添新鲜血液。厂革会现有的二十九名委员中，年纪最大的六十一岁，最小的二十一岁，三十五岁以下的占一半以上，新老干部结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保证整个领导班子朝气蓬勃，坚强有力。

良工阀门厂革命委员会诞生以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革命和生产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在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个厂的干部和群众，决心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革命委员会这一新生事物，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更好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尾巴、《水浒》及其他

文 波

尾巴之于动物，有重要的功能。牛马舞尾以驱蚊蝇，雄鸡翘尾以助斗威，壁虎断尾以避强敌。至于鸟的凌空和鱼的游翔，更须借助尾巴的功能。尾巴一断，失去了舵，飞鸟或游鱼在广阔的天空或海洋中就会变得咫尺难行。

然而，既有尾巴，便脱不了畜生的本相。据《西游记》记载：孙猴子与灌口小圣斗法时，先变麻雀，继变游鱼，再变水蛇，但都被一一识破了。最后只得变座庙宇，可就是尾巴不好收拾，只得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可旗竿都是竖在庙前面的，怎么竖到庙后面去了呢？这个破绽一露，尽管孙猴子神通广大，七十二变，最终仍难免被人识破畜生的本相。

这种苦恼，也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伙党内走资派所共同具有的。他们尽管极善于伪装自己，使人不易识破，但身后都拖着一条长长的资本主义尾巴在。

由此而想到了邓小平对待《水浒》评论的态度。

评论《水浒》的运动刚一开展，邓小平一伙如坐针毡，胆颤心惊，在革命舆论面前感到岌岌乎危矣！特别是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忽儿说评《水浒》“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一忽儿又说“你怕什么，又不是宋江、投降派”，甚至恶毒地攻击评论《水浒》是有人借这个“做文章”，“搞阴谋”。气壮如牛而又胆小如鼠，活象是尾巴被踩住了似的。

评论《水浒》，研究历史，是为了研究阶级斗争的规律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评在古代投降派的头上，痛在现代投降派的心上。面对着革命人民对投降派的批判，邓记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赶紧把报刊文章中论述宋江架空晁盖的话选抄送上，说是影射，以显示其谋臣对主子的耿耿忠心。邓小平则故作镇静地说“不会”，力求稳住阵脚。一个急于宣称“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赶忙表白“对面王二不曾偷”。动作配合默契，双簧戏可真是演

得不错。他们玩弄这种断尾脱逃的壁虎式伎俩，目的是为了把牛鬼蛇神聚集其中的邓记谣言公司，装点成是一座神圣庄严的庙堂。然而，断尾扔在地上，罪证凿凿，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于是，“理论家”要炮制一篇“不同意现在党内还有投降派”的大文章，干脆把尾巴竖起来当旗竿，在旗竿上贴出“庙宇重地，肃静回避”的告示。但旗竿不竖在庙前面而竖在庙后面，却未免露出了尾巴的本相。可惜，旗竿尚未树起，邓记谣言公司已告破产。不然的话，这篇反面教材倒是很能使革命人民一开眼界的。

邓小平忌讳“宋江架空晁盖”，这正是由于他的这条长尾巴是见不得人的。所谓“架空”者，篡夺领导权也。一切革命队伍中的投降派要搞投降，必定要篡夺领导权，这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批宋江一触及这个要害问题，邓小平就受惊若此，正说明这是揪住了邓小平的黑尾巴。古代宋江已经做的，也就是现代邓小平正在做的。邓小平的惊惶不安，正好表明了他就是现代的宋江。

细细思量一番，不禁深刻地领悟到一个道理。《二月提纲》说搞“学术讨论”，邓小平也说过“学术观点可以长期共存”云云，仿佛学术领域是一块与政治无关的净土。要真是那样，那么评一部几百年前的小说可算是十足的学术了，“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你们这些人又着的什么急？可见我们不那么看，他们也并不那么看，不过他们喜欢这样说用以骗人罢了。在革命大批判的照妖镜下，一切妖魔鬼怪终将现出它的原形。为此，我们必须把批邓的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同时，对于那些曾经误认邓记谣言公司为神圣庙宇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思想上形形色色的尾巴是藏不住的，应当把它亮出来，割掉它，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努力改造世界观；在批邓的斗争实践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不然的话，“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邓小平的语言学

季 尚

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忽而咬文嚼字起来了，他一会儿讲什么什么“语言”不能用，一会儿讲要用“严格的词句”，一会儿又讲有些话“太锋利”，要“琢磨”一下。俨然是一副语言

学家的架势。

邓小平对语言如此注意，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写文章，做演讲，为了表达得更加准确鲜明生动，对语言进行“琢磨”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对邓小平不适用。他心里想复辟，嘴上却不得不讲革命，口不从心，口是心非，当然不好直截了当地说话作文，这就使他在语言上不得不再三“琢磨”了。

你看，他做梦也在想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个话要是公开说出来，那可“锋利”得会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本相。“琢磨”的结果，是接茬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加上“为纲”二字，就把革命的词句偷换成修正主义的内容了。那位被邓小平倚为“顾问”的“理论家”，也深谙这种“语言学”。他不是声称“要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吗？怎么“用”法呢？一份《科学院汇报提纲》，在“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科技路线”标题下，引用了十条毛主席的话。另一份《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在“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办工业路线”标题下，引用了六十六条毛主席的话。但引用这些话，也是加了一番“琢磨”的。斩头去尾者有之，断章取义者有之，偷换重点者有之，凭空捏造者有之。“琢磨”来“琢磨”去，目的是为了盗用革命的语言表达修正主义的思想。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

不要以为“琢磨”一下，就可以天衣无缝，完美无缺了。不。既要盗用马克思主义词句，又要表达修正主义的思想，总是要矛盾百出的。什么“复无产阶级之辟”啦，什么“无产阶级还乡团”啦，就是邓小平“语言学”中特有的词汇。复辟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就是反革命，无产阶级哪有什么复辟？还乡团就是对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杀人放火，什么时候有过无产阶级的还乡团呢？在正常人看来，这很不通。但这是邓小平精心“琢磨”出来的“严格的词句”，他要复辟，要搞还乡团，又不好赤裸裸地使用这种语言，于是就加上了“无产阶级”这一类限制词。要说通，那就通在这种词语维妙维肖地勾划出了邓小平打着革命旗号干反革命勾当的两面派行径。

这种现象并非邓小平所首创。斯大林说过：“人们、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术语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林彪为了反党的需要，生造许多特殊术语，人们是很熟悉的。“复无产阶级之辟”一类，则是邓小平强加到语言中去的特殊术语。要是它有什么用的话，就是为我们识别修正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线索。

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走资派是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代表

庄 岚

阶级分析是革命的重要武器。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主席这一指示，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党内走资派的阶级实质，认识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谓经济地位，也就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不兼有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党内走资派，极力维护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

先从生产资料占有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这两种所有制下，劳动人民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集体经济单位的形式，作为一个整体来占有和支配属于他们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以及产品的分配权，集中体现为政治上的领导权。由于存在着两种所有制，实行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规律等经济范畴，虽已受到了限制，但仍然起着作用。不仅在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而且在各个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都必须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因而掌握领导权的这一部分人，能不能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利用价值规律等在现阶段的某些积极作用，还是任意扩大商品交换的原则，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直接关系到所有制的阶级性质。毛主席曾经指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

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里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都是商品交换原则恶性膨胀的表现。如果一个部门或单位的领导权被走资派所把持，极力推行这一套货色，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变成以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价值增值的运动，变成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那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会变成一个徒有虚名的“外壳”，而实际上成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事实上就是丧失了这部分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由于不是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基础上，因而革命队伍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但毕竟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旧的社会分工，存在着等级制，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即使在今天必须破除的在人们相互关系上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等等，也往往是破了又生，生了又除。如果某些部门的领导权被走资派所篡夺，他们就会强化和扩大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情形在今天的苏联看得特别明显。在苏联的国营企业里，工人阶级完全成了被榨取剩余价值的人身材料。企业经理可以用任何一种“理由”解雇工人，而工人则只有“遵守劳动纪律和内部规则”，俯首帖耳地干活的“义务”。在苏联的集体农庄里，农庄主席骑在农民头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们自己也供认，他们对农民是“起着—根鞭子的作用”。看，苏联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广大工人、农民的关系，已经完全成了雇佣和被雇佣、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露资本主义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时指出：工人“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共产党宣言》）今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归根结底，就是要使无产阶级重新套上资本的锁链，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

党内资产阶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竭力强化和扩大在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社会主义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就是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劳动的不同情况进行分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哥达纲领批判》）事实上，在分配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现象。对于这种不平等，究竟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步加以限制、最后消灭，还是任意强化和扩大，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恩格斯在讲到阶级的产生时就指出：“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反杜林论》）扩大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允许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意味着阶级差别的扩大。今天，在苏联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一小撮资

产阶级特权阶层和精神贵族，不就是在复辟资本主义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剥削阶级吗？他们利用窃取的地位和职权，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五花八门的种种特权和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的手段，大量侵吞工人、农民的劳动果实。而广大工人、农民完全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越来越陷于贫困的境地。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努力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于保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是多么重要。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特别赞扬了公社英雄所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法兰西内战》）而象邓小平这类马克思主义叛徒们，一听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那样反感，那样丧魂落魄，就因为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了他们的命。

通过阶级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今天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完全代表了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他们个人，虽然不一定象老资本家那样拥有资本，开工厂、办银行，但他们那条极力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路线，集中反映了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愿望。如果说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资本论》），那么，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他们的灵魂就是被打倒而梦想复辟的老资产阶级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新资产阶级的灵魂。而一旦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大权，就会整个儿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全盘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公开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到那时，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就会按照资本和权力的大小重新瓜分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林彪炮制《“571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邓小平大搞复辟翻案，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社会主义时期在党内会出现走资派，除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等各种原因，从走资派所处的社会地位来分析，也决不是偶然的。恩格斯在论述原始社会后期“起先的社会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时，指出其中一个因素便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反杜林论》）正是这些“个别成员”利用管理公共财产的机会，凭借掌握消费品和产品的分配大权，从中渔利，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剩余产品，使得在氏族公有制的土地上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使得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变成了拥有各种特权的统治者。走资派的生产虽然要复杂得多，但也有类似之处。恩格斯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又提到，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毛主席最近也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革命导师的话，不仅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党内走资派的要害，而且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走资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资产阶级,这是不奇怪的。任何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例外。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就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走资派还在走”,就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不同。修正主义怕说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尤其怕说党内会出现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拚命要用“全民党”“全民国家”之类谬论来自欺欺人。邓小平一听到“走资派”三个字,就象阿Q听到别人提他头上的癞疮疤一样害怕。就因为,如果他们承认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他们自己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而这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敢于承认党内会有资产阶级,而且敢于搞文化大革命,敢于发动群众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走资派作坚决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最后把资产阶级送进历史的坟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埋葬自有人类以来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伟大革命。“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充分认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搞清楚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重大问题,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上接 36 页) 修正主义路线下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他们在各个领域无限制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今天的苏修实际上是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只剩下了一个外壳。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和社会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却日益贫困化,重新沦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这就说明,混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一旦复辟得势,其凶狠和毒辣比资本家还要厉害。

回顾列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对照今天苏修背叛列宁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将有助于我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加深认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深远意义,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一类走资派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所包藏的祸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一定要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继续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到底!

列宁是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

翟海范 贻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不仅面临着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反抗的威胁，并且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列宁说，正是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产生着许许多多新的一代资产者。因此，要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仅要战胜国内外敌人的颠覆和反抗，还要在无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说：“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为了实现这一艰巨任务，列宁进行了多方面的斗争。

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列宁就以极其果断的手段，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剥夺剥夺者”的著名公式，发动了一场“用‘赤卫队’进攻资本”（《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斗争。列宁亲自起草和签署了一系列文件法令，把土地、银行、铁路、商船、工厂企业和外贸机构收归国有，在所有制方面取消了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列宁并没有满足于所有制形式的改变，而是十分注意到要让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他说：“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现的他们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并进而实现工人管理，保证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列宁在解决所有制问题的同时，极为重视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指出，“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国家与革命》）在这个基础上，甚至会由于收入高低的悬殊，重新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因此，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就宣布实行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即一切官员的报酬“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论两个政权》）。列宁把实行这一原则看作是“无产阶级‘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列宁亲自起草了《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吏报酬数额》的决议，提出必须采取最有力的措施降低一切机构、企业中高级职员和官员的薪金；并特别规定了人民委员每月薪金不得超过五百卢布，这与当时苏维埃俄国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大体一致。之后数年内，苏维埃工资标准虽有几次变动，但基本上都坚持了这一原则。

同时，列宁还坚决反对在物质待遇方面搞任何特殊化。列宁强调指出，必须制订有效

措施,来消除党内专家、领导干部同劳动群众在生活条件、工资数额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他认为,这种不平等会破坏民主制,并且是腐蚀党和降低共产党人威信根源。当时由于战争消耗了大量物资,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需要对一些重点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在物质上给予必要的照顾和支持。这样,就产生了在物质条件普遍困难的情况下,物质待遇的差别逐渐增大的趋势。列宁对于这一现象十分关注。党内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借此机会,在他把持的运输工会中大搞特殊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列宁认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对重点部门给以适当照顾是可以的,但决不能过份,并且指出:“必须逐步地然而坚定不移地过渡到平均制。”(《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列宁自己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以身作则,自觉带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和普通工人一样吃黑面包干,拿同熟练工人相仿的薪金五百卢布,在严寒的冬天,穿的是一件单薄破旧的外套。有一次,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擅自把列宁的薪金提高了三百卢布,受到了列宁给予的严重警告处分。罗沙工厂的工人为了列宁的健康,送去一块自己织制的衣料,并且在信中说:“如果你,我们的导师和领袖,穿上我们亲手织的布所做成的衣服,我们该是多么幸福啊!”列宁谢绝了,在回信中严肃指出:“送给我礼物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并要求把这一意见转告全体工人。列宁对他那件破旧的外套曾经说过一段十分感人的话,他说:我们一切为着苏维埃国家的巩固,衣服穿得破烂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要知道,我们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

为了防止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对党的政治生活的腐蚀,根据列宁的意见,俄共(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年,苏维埃曾着手制订对党政工作人员征收收入提成的计划。一九二〇年,又作出了严格禁止党员负责干部领取个人特殊工资奖金以及额外报酬的规定。在一九二二年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在职工中开始实行统一的十七级工资标准。当时俄共中央委员、部长、省委书记的工资相当于工人最高工资标准的二倍多。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定期解决党员工资过高的问题,规定出一定限额,凡是超过限额的部分都用来作为党的互助费。以后又明文规定,凡共产党员工资比十七级工资标准高一倍半的,从超过部分扣除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作为党的互助费。

列宁还严格制止在党内实行同资产阶级专家一样的高薪制。由于当时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而无产阶级还缺乏管理经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提出付给资产阶级专家高薪的政策。一九二三年又开始实行个人特定工资制,对少数专家给予更高的薪金。到一九二四年,专家的特定工资与工人最低工资的差距达十七倍到四十六倍。在这个问题上,俄共(布)党内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说:在给专家高额薪金的问题上,“我们”“比列宁要右一些”,“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任何违背原则的地方”,完全暴露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丑恶灵魂。列宁针对分配方面出现的悬殊状况,指出这是一种暂时的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

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列宁把付给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称之为“贡款”，并且强调指出：“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也要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均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号召全党必须同这种不良影响作坚决斗争，制止把这种高薪制的做法行使到党内专家和负责干部中来。根据列宁这一指示精神，一九二四年苏维埃最高经济委员会明确规定，在机关或企业中以专家身份或从事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工资，都应按照一般工资等级表的标准确定，在一般工资基金中支付，不得从“专家”基金中支付。当时党政负责干部和党员专家的最高工资仍旧保持在工人最高工资的二倍左右。

为了冲破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列宁始终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党，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号召共产党员和有觉悟的工人以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列宁要求党员同那些用老眼光看待劳动量的旧习惯作斗争，批判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列宁满腔热情地支持和倡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认为它“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列宁说：“我们要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咒诅的常规，克服这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还亲自参加了清理克里姆林宫广场的义务劳动，并且在一九二〇年把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包括所有负责干部在内的全体党员的绝对义务，写进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的决议。

列宁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还非常重视在人们相互关系问题上的继续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碎了，旧官僚被赶跑了，但他们中一些人又改头换面重新钻进苏维埃机关；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还产生了一批新官僚。列宁曾明确指出：“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对当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出现的专横武断、不平等待人、追求各种特权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注意到防止工人政权中有人变成官僚的危险，认为必须在革命胜利后立即采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三项办法：①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②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③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要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列宁就采取切实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列宁签署和颁布了一系列废除特权、废除等级制度的法令。在国家机关中取消一切等级制度和文官衔职；在军队中废除军衔、军阶、一切特权和各种外表上的差别；在知识分子中取消一切学位、学衔和特权。

在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布），一方面不断清洗那些重新钻入苏维埃政权和党组织里的旧官僚分子，以及被资产阶级腐蚀了的分子；另一方面大力提拔工农中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代表进入国家机关和军队中工作，改变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成份，使苏维埃政权真正掌握在工农手中。列宁十分重视提拔工农新干部，坚决反对认为普通工人农民不能管理国

家的资产阶级偏见。他说：“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列宁把“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生力量”（均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当作大事来抓，反对论资排辈。十月革命胜利后，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建立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就是由普通工人直接承担的，外交人民委员部机关则是由一个普通的水兵组织的。关于从工农兵中选拔新生力量的问题，在列宁生前俄共（布）历次党代表大会都有过相应的决议。

列宁还经常提醒新老干部必须参加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定期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如规定每个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会的委员每年至少到地方上去两次。要求长期担任苏维埃或党的工作的人员下放到机床和耕犁旁去工作，享受与普通工人相同的生活条件。要求在工厂、农村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尽可能多地直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不应当作单纯的管理工作。列宁曾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某些委员或部务委员会某些委员或者其他身任要职的同志们，调到甚至是县里，甚至是乡里去工作呢？”（《论粮食税》）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脱离实际以至蜕化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列宁曾亲自拟定了《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草案中甚至具体写明了苏维埃机关都必须张贴接待群众来访的日期和时间的规定，而且要贴在人人可以看到的大门外面；接待室必须设在可以自由出入，根本不需要出入证的地方，等等。列宁对压制群众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一次，有两个农民因地方政府征用他们的马匹，写信给人民委员会主席申诉，而处理这个问题的首都特别委员会却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在信封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工作太忙，根本没有功夫来管这些琐事。”列宁对这件事十分愤慨，当即下令给国家监察部，把写这个批语的官僚逮捕起来。

列宁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曾经指出，由于商品经济、货币交换的存在，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为了限制这些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不仅在理论上作了大量论述，并且在实践上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对利用商品交换进行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的人进行了坚决打击。列宁还特别强调要警惕商品交换的原则对党和无产阶级肌体的腐蚀。当时在一部分工人、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中，有的投机倒把，有的贪污受贿，通过各种方式，不择手段地捞取商品和货币，成了“耐普曼”分子。他们满脑子浸染着“只要我能够捞一把，哪怕它寸草不生”的卑鄙龌龊的发财思想。列宁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指出，这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侵蚀所造成的恶果。因此，列宁一再告诫全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必须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作不懈的斗争。

列宁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打击了资本主义复辟势力，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当时俄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头子如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对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很反感，顽固地推行一条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也正是在这条、（下转 32 页）

漫话中国历史上的等级制

石秉实 曹思峰

在埃及首都开罗的郊外，奔腾的尼罗河畔，矗立着一座座金字塔。它造型奇特，底宽顶尖，就象汉字中的“金”字。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奴隶主头子——法老的坟墓，是千万奴隶血汗劳动的结晶。它向我们揭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真理，也形象地描绘了阶级社会中由层层等级叠砌而成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共产党宣言》）人们划分为等级，是阶级社会的社会现象，等级制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制度。

但是，等级和等级制并不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历史现象。在原始社会里，没有阶级，也没有等级。原始社会的后期，随着原始公社的瓦解，人类向阶级社会过渡，才出现等级和等级制的萌芽。等级和等级制，是人类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让我们从中国历史上看看等级制是怎么回事吧。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奴隶制社会第一次把人类分裂为奴隶主和奴隶两大对抗阶级，同时也第一次划分了森严的等级，建立了等级制形式的阶级统治。在我国商代和周代的奴隶制社会中，高踞在社会顶端的是最大的奴隶主贵族——“王”或“天子”，以下是各级奴隶主，压在最底层的是千百万奴隶。“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上有这样的记载：“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奴隶社会最基本的等级是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抗的阶级。列宁指出：“阶级同时也是特别的等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既是等级也是阶级的鸿沟。在上面的十等人中，士以上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皂以下是被统治的平民和奴隶阶级。以这个鸿沟为界，奴隶主作威作福，锦衣肉食；奴隶做牛做马，日夜操劳。奴隶主活着，奴隶要受他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甚至被随意屠杀；奴隶主死了，奴隶还要殉葬。奴隶社会的等级差别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统治基础上的。

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等级也十分森严。由于占有的奴隶和其他物质财富的多少不等，也由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亲疏远近不同，奴隶主之间政治权力的大小和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差别，形成不同的等级。商代的王、侯、甸、男、卫、邦伯，就是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等级。西周是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等级制也发展到高峰。奴隶主内部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诸侯又分为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再各分上中下三等。等级制度支配着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据《周礼》、《仪礼》记载，天子的帽子——“冕”，前后各垂十二串白玉珠，诸侯的“冕”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士只许戴一顶兽皮做的皮弁。天子和诸侯中的公可以穿袞龙袍，但天子龙袍上的龙上仰，公的龙袍上的龙下俯。侯、伯的袍子只能绣锦鸡，子、男绣老虎和猴子，卿、大夫只能绣一种图案。奴隶主贵族在祭祀或宴享时“列鼎而食”，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各级奴隶主的菜单也不一样，天子吃的珍肴有一百二十种，诸侯、上大夫只有几十种。吃的是大鱼大肉，因此称“肉食者”。大夫以上吃精白米，他们的子弟被称为“膏粱子弟”。士以下就只能吃小米。其他诸如住房子，坐车子，都有具体的等级规定。生前讲等级，死后也讲等级。不仅坟墓的大小，葬仪的格式要讲等级，杀殉奴隶也要讲等级。天子、诸侯杀殉，多的几百，少的几十；大夫、将军杀殉，多的几十，少的几人。奴隶制的等级制就建立在千千万万奴隶的白骨堆上。

孔老二不是喜欢侈谈“礼治”吗？“礼治”就是西周奴隶制王朝制订的一整套以等级制为核心的“礼乐”制度。它实质上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奴隶主阶级通过“礼治”确立和维护整个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等级统治，调节各级奴隶主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保护大奴隶主们的利益。“制礼作乐”的大奴隶主周公说：“天子祭祖宗用了殷礼，就能分辨尊卑贵贱的等级。”一个名叫过的奴隶主贵族公开说：“没有礼，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就颠倒了，怎能保证长远的统治呢？”各级奴隶主必须严格遵守“礼”的规定，做到“礼仪卒度”，“维其有章”。谁敢于破坏“礼”规定的等级制，就等于破坏了奴隶制统治，就是大逆不道。因此，即使奴隶主改革派的政治家也不敢违礼。春秋时，齐国下卿管仲奉齐桓公之命出使周王室。周襄王因为管仲“尊王攘夷”有功，想破格用上卿的礼仪款待管仲。管仲说：“您用上卿的礼接待了我这个下卿，齐国还有两个上卿，他们要是来朝见天子，该用哪一级礼仪接待呢？”坚持按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接受了下卿的礼。这叫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谁要是不顾等级身份，乱闯乱撞，最少也得挨一顿臭骂。公元前五八五年，郑伯到晋国去见晋伯。郑伯同晋伯同级，按规定，双方互献见面礼的地点应在两楹中间，不能多跨或少跨一步。郑伯想讨好晋伯，献礼心切，手抱礼物急匆匆地走偏了一点，旁人想阻止也来不及。事后只听到一片骂声：“该死的郑伯，国君当不长了！”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不断起来造反，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意味着奴隶制等级制正在土崩瓦解。而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奴隶制等级制的极其顽固的维护者。孔老二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破坏和混淆贵贱等级的一切言行都深恶痛绝。季氏无视天子、诸侯的等级，舞八佾、祭泰山，他叫嚣：“是可忍，孰不可忍！”卫国大夫仲叔立了战功，卫君允许他奏诸侯音乐，用

诸侯马饰，孔丘就乱发议论：“天子、诸侯的器（等级特权）和名（名号）怎能给人？这不等于亡国吗？”他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论，就是要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他要“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奴隶制等级制的统治。到了“礼治”已基本破坏的战国时期，作为齐国三卿之一的孟轲还做着复辟奴隶制等级制的迷梦，大力鼓吹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次和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的六等位置，企图永远保持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但是，奴隶制等级制作为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然随着奴隶社会经济基础的瓦解而瓦解，复辟狂的任何叫嚷谩骂，都挽救不了奴隶制等级制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屠狗与贩缗，突起定倾危”

新兴地主阶级为了革奴隶主阶级的命，建立封建制度，就要冲破奴隶社会等级观念的束缚，擢用本阶级的代表人物，还不太讲究等级和等级观念。秦始皇身为国君，却能和法家尉繚同饮食共起居；在朝廷上，大臣博士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他用人也不论门第，不讲资格。秦王朝的丞相李斯，原来不过是上蔡的一个布衣。十二岁的“儿童团员”甘罗，资历可谓浅矣，却位在许多老头子之上，当了上卿。汉高祖刘邦在起兵反对赵高复辟政权以前，是个小小的亭长；手下的文臣武将，除张良是个贵族外，其余多是狱卒、骑将、卒史出身。陈平、王陵、陆贾、酈商、酈食其、夏侯婴出身平民，娄敬赶大车，灌婴贩丝绸，周勃给死人吹喇叭混饭吃，刘邦的连襟樊哙还是杀狗的屠夫。“屠狗与贩缗，突起定倾危”（李商隐），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等级低的被统治者必然起来造等级高的反动统治者的反，正是这些原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粉碎了奴隶制复辟，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如果讲等级，论资格，那刘邦们就一辈子也出不了头了。

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也就是用一种等级制度代替另一种等级制度。地主阶级的剥削阶级本质，是不可能废除等级制的。地主阶级的秦王朝，从商鞅变法时起，就实行了二十等爵制，第一级到第四级是士，第五到第九级是大夫，第十到第十八级相当于卿，十九、二十级则可称诸侯。爵位大小与官的大小大致相当，享有的封建特权也不一样。汉承秦制。刘邦建立汉王朝不久，除了继续实行二十等爵制外，还叫叔孙通制礼作乐、立朝仪，把文臣武将们吓得连头也不敢抬。但是，在封建社会初期，由于存在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因此，地主阶级的封建等级观念还并不那么浓厚。汉文帝有一次乘着四匹马拉的华丽的车子到名将周亚夫驻军的细柳营去劳军，一进营门，士兵就过来干涉，说是军营不得驰骋，汉文帝只好下来跟在车旁慢慢地走。周亚夫见了汉文帝，说自己甲冑在身，不行跪拜礼，只能行军礼。这样做，看起来好象有点冒犯了皇帝的尊严，但汉文帝不以为怒，反而很高兴，着实把周亚夫夸奖了一通。汉武帝在建立封建大一统国家过程中，“方征讨四夷”，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他起用奴隶出身的卫青做大将军，提拔布衣公孙弘做宰相，还设立十三部刺史，规定俸禄六百石的刺史可以“以卑临尊”，劾查二千石以上大官的罪行。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地主阶级从不太强调等级观念到重视等级观念有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从革命阶级转变为反动阶级，由尊法反儒转变为崇儒反法的过程紧密相连的。鲁迅说得好，地主阶级在暴发以后，“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鲁迅：《坟·论“他妈的！”》）西汉末期以后，在儒家路线统治下，在地主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太官僚大地主的特权阶层——世家大族。每个世家大族有自己的大庄园，在庄园里从事生产劳动的是千万个佃客和奴婢，他们是社会上最低的一级，没有人身自由。世家大族享有政治经济的各种特权，形成了世袭等级制。正如鲁迅指出：他们的子弟“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只要是“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坟·论“他妈的！”》）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窟窿”，就是世袭等级制的写照。东汉杨震，官至太尉，儿子杨秉、孙子杨赐、重孙杨彪都做到太尉，四代三公。东汉末年的大军阀袁绍也出身于“四世居三公位”的贵族世家。至于中、小地主，在地主阶级内部享受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相对较少，称为庶族地主。

世族地主为了将自己的特权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在魏晋时期实行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以祖宗“家世”品定等级，把地主阶级分成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各分三级，共九级。三品以上是“上品”，可以世代做大官；四品以下是“下品”，永远只能当小官。这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这个制度是维护世族大官们的利益的。这些人只要血统高贵，“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坟·论“他妈的！”》）当时就有人说，“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说，世族子弟挂了著作郎的虚衔，每天坐车到办公地点连车也不下，只报个到就算了事，做了秘书郎官，常常请病假，连赋诗答策也雇人代替。他们虽然是一些典型的寄生虫，但是因为等级高，照样可以高官厚禄，人家奈何他不得。

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特权和社会地位，它们之间从政治地位到婚丧嫁娶，都有非常森严的界限。南朝宋武帝时，路太后的侄孙、庶族出身的路琼之，想结交世族王僧达，特地穿上华丽的衣服，驾起考究的马车去拜访王僧达。王僧达毫不领情，面孔一板，大骂路琼之是“门下驸人”，叫人把他赶走，还把他没坐热的椅子烧掉，因为世族不能再坐庶族坐过的椅子，原来屁股也得分等级。路太后闻讯大怒，要宋武帝惩办王僧达。谁知宋武帝大不以为然，说：“路琼之自己不好，谁叫他去登世族门呢？”由于世家大族在社会上拥有强大的势力，连皇帝也不愿违背上下品等级的界限，身为“国母”的太后也拗不过“士庶之别，实为天隔”的规矩。为了防止庶族地主通过联姻来提高自己的等级，世族地主在婚嫁问题上特别强调要“门当户对”，不让庶族钻空子。北魏名门大族崔巨伦的姐姐瞎了一只眼，世族中找不到老公，崔家想降低身价，把她嫁给庶族。崔巨伦的姑姑听到说：“不行！世族女怎能嫁给庶族？！”不惜牺牲，叫自己儿子娶了这瞎眼婆娘。

官僚·等级·台阶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壁垒森严的门阀等级制度，只能加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世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矛盾。在一系列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特别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扫荡，世家大族迅速地衰落了。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是东晋和南朝著名大族），便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庶族地主力量的壮大，封建等级制度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坟·论“他妈的！”》）。唐初重修“氏族志”，修撰者把旧的世家大族崔氏放在第一等，唐太宗把他骂了一顿，明确指出以后不能只论几代以前祖上的情况，要按照今天官爵的高下作为等级。“氏族志”重新改写，把皇族李姓放在第一位。这件事表明，旧的世家大族地位下降了，功臣新贵和庶族地主的地位提高了，封建官僚等级制日益完备。

通过科举制度推行官僚制，是改变地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能读书做官的不过是一些大小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范围，从而使更多的庶族地主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

官僚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等级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唐宋以后，尤其显著。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以官做的大小为标准；政治经济特权的高下，也以官的大小为转移。隋唐时期沿袭前代的官僚等级制，规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度。各级官吏有品、有阶、有爵、有勋，还有只有称号而没有职务的散官。爵、勋是虚衔，爵有九等，勋有十二转。品、阶就是级别，每品有正、从之分，四品以下再分上下阶，共计三十阶（级）。各级官吏分别给予多少不等的土地作为俸禄。另外还有月俸、食料、杂费钱，在日常情况下，一品到九品相差约十二倍。到宋朝，宰相月俸三十万钱，一百石米。此外，每月还有几万“职钱”。冬春两季给绫二十四，绢三十匹，绵百两，还按品级供给茶、酒、盐、油、酱、炭薪、马料。最小的官员却只有几斗米的收入。此外，在服装、住宅、乘舆、称呼、礼节直到坐椅上的坐褥，一律有繁琐的等级规定。标明官品的舆服制度，烦得连礼部的官吏也搞不清楚。明朝嘉靖皇帝一次看到二品官张璠穿了件绣蟒的官服，悍然大怒，厉声责问阁臣：“二品官怎么穿蟒服？”吓得那个阁臣赶紧上前解释：“张璠穿的是陛下钦赐的飞鱼服，绣得鲜明，象蟒蛇而已。”嘉靖帝拍桌大骂：“什么？飞鱼怎么戳出两只角？！快给我剥下来！”森严的等级制也反映在教育、论罪等各方面。唐代规定，国子监只收三品以上大官的子孙，太学只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庶民百姓只能学律学、书学、算学。贵族、官僚犯罪，可以按等级高低减罪、免罪。死刑也能用金钱赎免。造坟也有制度。一品官造坟，半径达九十步，高一丈八尺。二品官就要减十步，降低二尺。七品以下的官，半径不得超过三十步，高不过六尺。小民百姓起坟，半径只有九步。

官僚等级制，也就是台阶制。要当大官，就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官僚升迁制度。早在北魏时，就有人提出了一种“停年格”，大致意思是，各级官吏只有

因病因事出了缺，才能将下一级官吏提上去，不得逾越。以后各个朝代，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着这一原则。依照这一原则，官员提升要论资排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绝不允许破格提拔。到了清朝，一个官吏要做到尚书、督抚之类的大官，成为人上人，要爬几十年，从年轻时爬起，不生病，不降职，爬到耳聋眼花头发白，还不一定爬到。

叠床架屋的等级制，成了末世封建社会一个沉重的包袱，谁要动一动，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招来整个统治阶级的惊慌和非议。这种情况，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论封建等级制怎么森严繁琐，也挽救不了封建社会的灭亡。

为最终消灭等级差别而奋斗

在资本主义社会，“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费尔巴哈》）解放后，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否定了几千年来那种等级森严的剥削制度。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三大差别，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及其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这种状况存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必然会通过鼓吹等级制思想，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复辟资本主义。

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极为反感，因为这触犯了修正主义大官们的等级特权。邓小平要保住修正主义大官们的特权，就要拚命鼓吹等级制。他自己就是一贯摆官架子，盛气凌人，从不与人谈心，也不听群众意见，以势压人的大官僚、大党阀，竭力要把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搞成猫鼠关系。他还顽固坚持分配制度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侵吞和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他甚至还妄图恢复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那种“台阶”制。这完全是为了维护他那一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维护他那一小撮走资派的特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通过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是为了培植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国家政权“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法兰西内战》），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从孔老二到蒋介石等形形色色的等级制鼓吹者都没有能够挽救旧制度的灭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企图通过鼓吹等级制思想复辟资本主义，也只能是痴心妄想。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消灭等级制。我们一定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彻底破除等级制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从井冈山的官兵关系说起

施 东 晖

搞“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是邓小平谈得颇多的一个问题。他在亲自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中甚至公然宣称：这个问题“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在他看来，“管、卡、压”这一套，原来是天经地义，什么社会制度下都一样，真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了。

究竟一样还是不一样？最近，访问了几位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红军老战士，听他们讲述了井冈山时期革命斗争的生动故事，对于邓小平的这种“一样”论，也是个深刻的批判。

要说“管、卡、压”，莫过于旧军队了。不是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吗？“长官”的话，就是法律，谁敢不服从？《水浒》中一群护送生辰纲的军汉，只想休息一下，不就得挨上杨志兜头兜脑的一顿皮鞭吗？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比杨志还要威风。他们戴着金丝眼镜，镶着金牙齿，套着金戒指，谓之“三金主义”，拿着皮鞭，系着皮带，穿着皮鞋，戴着皮手套，背着皮挎包，称作“五皮军官”。对于士兵，轻则打骂，重则枪毙。可说也怪，这支等级森严、层层服从的军队，一遇上没有什么军衔军阶、被称为“游击习气”的红军，却总是一触即溃。即使那些配备了“三金”、“五皮”的长官们上阵督战吧，士兵们可不信什么“不成功便成仁”那一套，一个小差就开到红军里来了。

原因很简单，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完全是两个世界。国民党军队里官和兵的关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而红军里头官与兵，只是职务分工的不同，他们之间是革命队伍的同志关系。毛主席在井冈山上创建工农红军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规定官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肉刑，废除繁琐的礼节，士兵管理伙食，经济公开，从军长到伙夫，吃的伙食、发的零用钱基本一样。为了保证这些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坚持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将支部建在连上，在连、营、团各级成立了士兵委员会。一切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士兵委员会有监督干部和向干部提意见的权利，有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处分的权利。在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还明确规定，接近士兵的连以上的

官长，应该随时看视受伤的和生病的士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子。这样，红军中就形成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官兵关系。要是按照邓小平的逻辑，国民党军队怎么样，共产党军队也得怎么样，那我们的军队还能夺取全国胜利吗？

由于当时红军的相当一部分官兵是从旧军队起义过来的，还有一些是俘虏过来的，红军中也有一些人一度很相信旧军队“管、卡、压”那一套。红军中有一位大队长，动不动就打人，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铁匠”。还有个连长，家庭出身好，打仗很勇敢，工作也努力，就是喜欢打人。他常说：“士兵不打不成材，队伍不打不好带。”士兵被打得受不了，都不肯留在他那个连队里。打人的事出在红军个别干部身上，根子却在旧军队盛行的军阀主义上。

毛主席发现这个情况后，非常重视，专门找那位好打人的大队长谈心，对他说，你晓得吧，现在大家叫你“铁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打人很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打人不好，大家都是阶级兄弟，要多做思想工作。并叮嘱他，你今后要改。对那位连长，也进行了说服教育。后来，这个大队长和那位连长，都改变了作风，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后，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邓小平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地要搞“管、卡、压”，十足暴露了他彻底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要搞“管、卡、压”，资产阶级要搞“管、卡、压”，一切剥削阶级要搞“管、卡、压”，搞棍棒的纪律，搞剥削阶级的专政。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没有真理，他们与广大群众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他们只能搞以势压人，以权卡人。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依靠的是千百万群众自觉的行动和革命的纪律，因而一定要破除“管、卡、压”。井冈山时期以来几十年的战斗历程，有力地驳斥了邓小平的谬论。广大红军指战员跟着毛主席上井冈山，粉碎蒋介石的军事“围剿”，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是靠对士兵“管、卡、压”吗？在极端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难道是靠对革命战士的“管、卡、压”吗？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社会主义建设，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大寨式的先进社、队到处涌现，大庆式的企业如雨后春笋，难道也是靠“管、卡、压”吗？事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批判了“管、卡、压”，改善了革命队伍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

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暴徒们，不是吹捧邓小平是如何如何“爱国爱民”吗？邓小平既然对广大革命人民是那样凶恶地要“管、卡、压”，说明他爱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邓小平无耻地背叛井冈山的革命传统，那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发扬井冈山的优良传统，努力造成一个更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

——赞三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胜利发电

金 盛 曦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三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已经安装在望亭发电厂运行发电一年多了。它发出的强大电流源源不断地通向工厂和农村，奏响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又一曲胜利凯歌。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丰硕成果。

祖国万里电网中的这一颗硕大明珠的出现，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和能力。工人同志自豪地称三十万千瓦机组为“造反机”、“争气机”——因为它是对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造反的产物，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的产物。“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为毛主席革命路线争气”，这句响彻“三十万”工地的口号，概括了广大工人阶级对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认识，说明工业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路线问题。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但是，党内走资派根本否定广大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行一条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长外国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围绕着三十万千瓦机组的制造权，就经历了一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上海工人阶级在一九五五年自力更生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六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又造出了二万五千瓩、五万千瓦的机组，以后又多次提出要向更大容量的机组进军。然而，广大工人迫切要求改变电力工业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却遭到了刘少奇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的嘲弄和压制。一九六五年，有人竟然不惜以相当于上海两个电站设备主机厂全部固定资产的代价，提出向外国进口一套二十五万千瓦机组。上海的工人知道这件事以后，强烈要求自己造三十万千瓦机组，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以及“造机不如买机”的谬论，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但由于刘少奇一伙利用手中权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是不给上海工人阶级造大容量机组的权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轰倒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上海工人阶级在一月革命风暴的高潮中，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夺回了被走

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赢得了三十万瓩机组的制造权。

上海工人争夺三十万瓩机组制造权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有骨气的，是不肯受洋气的。但是，制造权到手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实践证明，三十万瓩机组的整个设计制造过程，就是不断对修正主义路线造反、不断打破洋框框的过程。

靠什么去打破洋框框的束缚呢？就靠一股子革命志气。这里先说一个例子，看无产阶级是怎样发扬革命硬骨头精神打破洋框框的。叶片，被称作汽轮机的“心脏”部件，它的型线好坏直接关系到汽轮机的效率。一台三十万瓩汽轮机有近万片叶片，按照什么样的面貌设计叶片的型线，是一个大问题。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人从苏联弄来了一套汽轮机叶片的资料，奉作神圣得不得了的“天书”。这一回又有人捧出“天书”说：“‘三十万’的叶片还是按苏联的资料设计吧！人家的东西先进，就象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要超过零点一秒谈何容易啊！”

这里的所谓“天书”，不就是外国资产阶级设置的洋框框吗？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工人阶级根本不信这个邪，坚决反对“依样(洋)画葫芦”。上海汽轮机厂的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决心打破“天书”的束缚，创造性地进行叶片型线的设计。他们认真总结了国内汽轮机叶片使用情况的实践经验，对国外的技术资料进行了分析比较，做了大量的计算和实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设计了二三十种叶片型线，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了一种新型叶片。它的空气动力性能的各项指标都很先进，气耗损失系数比苏联的降低百分之一。工人同志称这种新型叶片为“争气片”。“争气片”的诞生嘲弄了“天书”，中国式代替了洋框框，从受洋气到扬眉吐气，这不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发展过程吗？让外国资产阶级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让党内走资派学着假洋鬼子的腔调胡说什么“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吧，中国工人阶级憋着一口气，已经创造出大量的人间奇迹驳倒你们。外国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纪录”，必将被中国工人阶级一个一个地打破。后来居上，这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上海工人阶级从一九五五年开始造汽轮发电机组到一九七四年三十万瓩机组并网发电，仅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而外国资产阶级走完这段路程却花了半个多世纪，这个事实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吗？

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有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而且完全有这个能力。工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把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产品叫做“争气牌”呢？它说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深入人心，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路线不得人心。它还说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能把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

没有条件也能创造条件上，说到底群众有办法。上海第一水泵厂是个四百人不到的弄堂小厂，要为三十万瓩机组制造给水泵，困难是够大的了。曾经有人断言，弄堂小厂造不出，造出了也不能用。他们振振有词地讲：“你们看看外国造这种给水泵是什么样的条件，第一水泵厂这个样子象个啥，还是进口吧！”可是，第一水泵厂党支部发动工人，把困难和措施逐一排队，搭棚棚，搞土设备，改革工艺，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拿出了三十万瓩机组的给水泵。要问这个样子象个啥？这就是无产阶级奋发图强的样子。在满脑子洋奴哲学的人看来，要是离开洋人、洋设备、洋办法，是办不成任何一件事的。但是，在一些人看来

根本没法办到的事，群众一起来就办成了。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都是历史唯心论者，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工人阶级，没有人民群众。只要“专家”、“权威”说一声难办，他们就下令不准工人群众去办，这就必然挫伤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多少“专家”、“权威”望洋兴叹的事情，不是都由工人群众办得很好吗？这表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协作产生新的生产力，这是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大搞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为了这套“三十万”机组，上海和全国有几百个单位，打破地区、行业和工种的界限，协同作战，出现了“千军万马齐踊跃”的动人景象。在上海汽轮机厂、上海电机厂、上海锅炉厂等主机厂，食堂、托儿所、医务室等后勤部门都动员起来支援生产第一线，口号是“为了造出‘争气机’，前方后方齐努力”。其他行业 and 单位，也在“当‘三十万’机组促进派”的口号下，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上海异型钢管厂为了配合锅炉厂拉出鳍片管，日夜奋战造出打孔机，改革了工艺；上海第二开关厂为了当好“三十万”的配角，工人群众支持一个六五届初中毕业生主持设计，造出了大容量的可控硅充电装置；以家庭妇女为主的长春塑料厂，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创造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色带液位指示仪；上海电力建设公司机械修造厂用蚂蚁啃骨头的革命精神，造出了适应“三十万”工程吊装需要的百吨塔吊；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程队的工人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把安装时间一再缩短，从破土施工到调试运行，仅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远在河南的某重点工程为了急“三十万”所急，把自己一套一万三千安培高压隔离开关主动送到了望亭。多少单位为“三十万”出力，多少人为“三十万”操心，这是无法统计的。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看起来办不成的事，许多单位、许多部门联合起来就办成了。这就令人信服地表明，自力更生的能力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洋阔人们嘲笑中国人象一盘散沙的时代过去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以计日程功的速度，将使得一切低估中国工人阶级能力的人们目瞪口呆。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有能力，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外国资产阶级卡我们的脖子，不可怕；资产阶级“权威”用洋框框吓我们，也不可怕；党内资产阶级利用手中权力压我们，同样不可怕，任何狂风恶浪都不可怕。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三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如同任何其他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不可能一下子就那么完美无缺。这套机组在调试运行的过程中，暴露了一些缺点和问题，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积极加以解决就是了。可是，三十万千瓦机组开始运行发电以后不久，邓小平就刮起了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在抛出那个崇洋迷外的“大政策”的同时，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诬蔑成为一团漆黑。在邓小平刮的右倾翻案风煽动下，一些人抓住三十万千瓦机组调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什么“这套机组是在危险的边缘发电的，不会长命的”。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电厂工人为了解决问题在检修时拍摄的照片拿去，妄图对三十万千瓦机组起诉判决。

屹立在大运河畔的三十万千瓦机组，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考验。“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这就是广大工人的回答。邓小平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三

十万千瓦机组，而广大工人则满怀由衷的喜悦，爱护这个自力更生的产儿。望亭发电厂年已七十的退休老工人刘申元说：“我操作过各种‘万国牌’小汽轮发电机，一直就想着有国产的大机组。现在终于有了，看一眼，摸一摸，都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主动回厂，每天爬到有十七八层楼那么高的锅炉房上面细细查看，提出了好多改进和提高质量的建议。望亭发电厂的工人为了扶植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在调试运行中积累了几十万个数据，作了一百多项比较重要的改革，同制造厂的工人一起进一步完善了三十万千瓦机组，使机组的运行发电日趋稳定。今年以来，这套机组已发电五亿多度。“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三十万千瓦机组顶着邓小平右倾翻案的“十二级台风”站住了脚跟，这是工人阶级以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从争得三十万千瓦机组的制造权到不断完善的全过程，也就是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相继破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从三十万千瓦机组看电站设备制造工业，从电站设备制造工业看整个社会主义工业，都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为什么要丧心病狂地反对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呢？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列宁曾经说过：“当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同任何外国人勾搭，背叛人民，出卖祖国。”（《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党内走资派作为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外国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政策的规律性的表现。他们崇拜外国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蔑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能力，往往表现为拿盲目进口压国内生产，抬出洋主子压自力更生。中国工人阶级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不会允许党内资产阶级那条崇洋卖国路线得逞的。外国资产阶级卡得越凶，中国工人阶级斗得越狠，党内资产阶级越是崇洋迷外成瘾，广大工人群众走自力更生道路的步骤越是坚定。外国有的先进技术，我们一定会有。外国没有的先进技术，我们也一定要创造出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国工人阶级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的雄心壮志，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三十万千瓦机组就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出来的，就是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出来的，就是同形形色色的洋奴思想斗出来的。邓小平连一套国产的三十万千瓦机组都容不得，那副搞现代化的冒牌英雄嘴脸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三十万千瓦机组站住了脚跟，邓小平也垮台了，但这并不等于斗争就此止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刘少奇垮台后，出现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自取灭亡后，又出现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会随着邓小平的垮台而自行消失。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今后还必然会长期地在工业发展问题上反映出来。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专家路线一类修正主义黑货还有市场，还有影响，还会通过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决不可丧失警惕，一定要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我们能够在斗争中破坏一个旧世界，也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建设好一个新世界，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和能力，也是三十万千瓦机组的胜利发电提供的结论。

在一个县委书记的身边

袁夏良

陈明其同志，原来是南翔公社一个生产队的记工员、保管员，后来当了三陈大队的大队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他推上了县委的领导岗位，担任了嘉定县的县委书记。最近，我在陈明其同志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下面记载的就是我在这段时期内的所见所闻。

“别忘了新党章的第一章”

有一天清早，他和平时一样，骑着自行车往下面跑。

“嘉定人民有气概，战天斗地干起来……。”城厢镇的高音喇叭里，传着阵阵激越的歌声；街头的电线杆上，横挂着“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巨幅标语；“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一类的宣传画，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夺目的光彩。自从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来，全县都处在的大干的热浪之中。这气氛，使明其觉得有点激动，但是他也隐隐约约地感到了点什么。

忽然，他发现前面有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蹲在街道的阶沿上，身前放着一只竹篓，等人去买他的大闸蟹。明其站在一旁看了很久很久。他想：这样的青年，正是农业学大寨的生力军，可是他为什么不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去，却在搞自由买卖？想到这里，他毅然地把自行车一锁，向那青年走去。他把这青年带到县委机关，问了个详细，然后教育他回去后要向大寨青年学习，投入到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去。

那青年走了，可是这几天来在下边劳动、座谈中接触到的许多事情，却在明其的脑海里泛了出来——

在马陆公社彭赵大队劳动时，他听到，男女青年谈恋爱，第一次走动要吃一顿“走动酒”。

在一次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七、八个社员，又是劳动车，又是杠棒、绳子，车上还贴了红纸，前呼后拥，说是给一个女青年去运嫁妆。

有个大队的贫下中农还揭发，那里死了一个富农，大队里竟然允许开“追悼会”，有一个党支部委员还在“追悼会”上致了“悼词”。

这一连串的事情，使明其敏锐地感到，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

吃了午饭，他拉上县委副书记温彦同志，又叫上我，一起到朱桥、黄渡等几个公社去，

摸一摸在建设大寨县的热潮中出现了什么倾向性的问题。朱桥公社党委书记何约文同志说，这两天检查了一下秋收和秋播的情况，发现有个别生产队粮食面积少种多报，经济作物面积以多报少。有一个大队，一下子少种了一百多亩麦子，多种了四十几亩大蒜（嘉定特有的出口产品）。

明其听了这个汇报，蓦地站了起来：“他们这样搞法还能算是学大寨吗？大寨的根本经验在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啊！”

回来的路上，明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在这大干的热潮中，作为一个指挥机关，该考虑些什么、注意些什么呢？”

晚上的常委会，研究如何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明其开门见山地说：“大家先谈谈阶级斗争状况吧！”

“我先来谈一点。”在公社兼党委书记的新干部汤克彪同志第一个开炮。他说：“最近群众批评我们说，‘现在只见你们讲大干，抓大干，大学大批还要不要？’我感到群众的这个批评既尖锐又正确，我们县委前一段虽然也讲了学大寨要学根本，但实际上抓大干比之抓大学大批要来得狠，阶级斗争这个纲抓得不紧啊！”

明其点了点头，带着沉重的口气说：“县委出现的这种倾向，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自从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以后，我总感到压力很大，曾经有过‘不怕阶级斗争抓不牢，就怕全县生产往下掉’的错误思想。这实质上是唯生产力论在作梗。这种讲了干，忘了纲，在一片‘大干’声中模糊了阶级斗争观念的倾向，是很危险的！”

喝了口水，他高声说道：“大干要抓纲，基本路线不能忘！这个口号大家看看怎么样？”见大家都表示赞同；他又补充说：“总而言之，不能忘了，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只要这个使命没完成，我们就要坚持阶级斗争这个纲，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这一点，我们的新党章上是写得非常明确的，我们应当经常学习新党章的第一章——总纲。”

于是，不久后召开的一次三级干部会议，打破了原来那种往往“讲生产一大套，讲阶级斗争穿鞋戴帽”的现象，花了三分之二的时间议阶级斗争，批奇谈怪论。为了使大家更好地投入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去，县委还特地组织了各社、镇、局以及各公社农业学大寨小分队的负责人看了《决裂》这部电影，并且办了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班。有人说，这样忙的时候，你怎么舍得让大家看电影、办学习班的？明其说：“心里没有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那危险得很啊，同志！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不批判、不斗争还了得吗？这样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如果不抓住，别的事情忙得再辛苦，也只能是白忙，弄得不好还是在帮倒忙哩！”

“警惕被资产阶级法权俘虏”

正月初一，明其回家吃了午饭，刚跨出门，迎面过来一位中年妇女，向他询问道：“陈明其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是这里。有什么事？到屋里坐一会，我就是。”那妇女把明其上

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又朝他身后的房子看看，似乎还有点不相信。

进了屋，那中年妇女说：“陈明其同志，我知道你平时工作很忙不在家，所以趁今天大年初一赶了来。我是来告状的！”

大年初一来告状，这是怎么回事呢？明其吃惊地等她说下去。

“我们那个队长，还是个大队党支部委员哩，从去年十一月底到现在已两个月，在田里只劳动了两个半小时，专门出去‘摸汤罐’（帮助办婚丧喜事的人家烧菜），但他却照记强劳力的工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们队长这样做算啥名堂？我看要变成‘高级社员’了！”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明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并说已经派了信访组的同志去调查处理了。他严肃地说：“你别小看这种事，现在就是有这么一些干部，利用职权搞特权，欣赏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我们对这些同志不加强教育，真有可能象那位女社员所说的，会成为‘高级社员’。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作为党的干部，每做一件事，心里都要想一想，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还是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要警惕被资产阶级法权俘虏啊！”

明其是说到做到的。他不但自己不做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事，而且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战斗。

县委在研究社队企业分配政策的时候，为了防止务工社员同务农社员出现收入上的差别，曾经提出，社队工业的分配水平不能过高。可是，当明其到一个公社请一些公社和大队干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的人不主张社队企业的职工和生产队社员同样分配，还说了好几条理由：什么社队企业是每天八小时做足的，生产队劳动忙时辛苦，闲时也轻松啦；什么社队企业职工搭伙在外，开支比在家里大啦；什么社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生产队高啦；等等。但同贫下中农讨论的时候，意见正好相反。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他带着这个问题一调查，一分析，原来，那些主张社队企业分配水平高一些、待遇好一些的干部，大多是儿子、妻子或老子已进了社队企业的。于是，他一直思考着要解决这个问题。

去年年终分配前，他把这个问题提交常委会讨论。常委们都同意他的看法，要采取措施，适当限制。于是决定：一，为了进一步缩小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之间的差别，对务工社员的分配水平进行适当限制。二，大队干部和各大队抽调到农业学大寨小分队工作的青年积极分子，他们的分配水平，都不能高于本队、本大队同等劳力的分配水平，不合理的补贴一概取消。一九七五年分配的结果，彭赵大队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之间分配上的差距，比一九七四年缩小了十八元。全县大队企业每个劳动力的分配水平，平均比一九七四年压缩了九点四元，而务农社员的分配水平却比上一年有所提高。这样，差别就大大缩小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明其说：“我们不仅自己不能做‘高级社员’，还要警惕有一部分人被资产阶级法权俘虏，变成‘高级社员’哪！”

“集体化不等于不会分化”

跟着明其到基层去摸情况，回到县里已过晚上六点钟了。明其在食堂里买了三分钱酱菜，急匆匆地吃完饭，赶紧向会议室走去。

开会的同志到齐了。明其说：“今天的常委会研究一九七五年的分配问题。先请农业局的同志发表意见。”

农业局的一位同志先汇报了几个点上的分配情况，并对一些问题作了分析，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差距很大。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来说，分配水平高的生产队，平均每人一百九十六元，分配水平低的生产队，只有九十七元，相差一倍以上。

明其有个习惯，开会的时候，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群众在发言，他都认真地作记录，并带有一红一蓝两支笔，记到重要的，就在下面打一道红杠，晚上再整理一下。听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笔，朝大家看看，想说什么。我知道，这件事触动了他的心。

一天晚上也是这个时候，我从城东公社开完座谈会回来，一脚踏进宿舍门，只见他伏在那张学生课桌似的写字台上，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连我进去也没觉察。

“又在写什么呀，这么专心的？”我开口问道。

他这才猛然抬起头。一见是我，便说：“我心里在想一个问题，想整理出几条意见来。”

“什么问题呀？”

“你不是到马陆公社去过好几次吗，别看它公社很富，积累很多，是个‘百万富翁’，可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大队与大队之间，穷富差距也不小。拿马陆大队来说吧，富的几个生产队，社员分配水平二百三四十元，和穷的队相比，高出七八十元。南马陆生产队有十二只大粪池，而穷的杨家生产队只有两只。”

明其这一说，倒使我想起了县农业局经营管理组的同志告诉我的几个数字：

长征公社真北大队，夏家宅生产队分配水平每人二百四十三元，徐家宅生产队只有一百三十元，相差百分之八十七；

望新公社宣高大队，西高楼生产队分配水平每人一百六十元，姚湾生产队只有九十九元，相差近一倍；

朱桥公社灯塔大队，第二生产队分配水平每人二百八十二元，第九生产队只有一百六十四元，相差百分之七十八；

全县分配水平最高的长征公社新宅二队，平均每人二百九十三元，最低的方泰公社方泰大队方中生产队，平均每人只有八十一元。

“弄得不好，可能出现集体经济之间的两极分化！”我不禁说出这么一句话。

“是这个问题，集体化不等于不会分化。现在有些穷队，连一间仓库都盖不起，一块好好的打谷场也没有，别说买农业机械了，就是日常生产资金也得靠贷款。这种生产队虽然为数不多，但我们必须加以重视了，不然的话，真会产生集体经济之间的两极分化呀！所

以,我在想怎样才能缩小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差距。”

明其在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曾经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作过分析。

从客观上来说,虽然农村的所有制变更了,但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的不平等,就是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有的队一个劳力平均有三、四亩地,有的队一个劳力只有亩把地,如果在生产水平相等的情况下,不就形成差别了吗?还有,有的队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找到了肥源也运不进去,搞副业门路又不多,而一些近镇、近路、近工厂的生产队,就可以获得级差土地收入。

从主观上来说,有的队领导班子不好,路线不正,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被压抑或挫伤了。有些公社、大队干部,往往不到穷队里去,而欢喜往富队跑。此外,没有帮助穷队发展以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养猪不发展就缺少有机肥料,缺少有机肥料又影响到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水平低,则影响到扩大再生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前几年,许多副业生产如蘑菇、蚌珍珠、出口鸡之类,都欢喜放到一些富队搞。这一来,富的越来越富,穷的却怎么也赶不上他们。这种状况,往往同有些大队干部是从富裕队里出来的有关系,他们的思想没有跳出小生产的狭隘圈子,虽然当了大队干部,做事情却往往只考虑自己生产队的利益。

我和明其谈着这些事,不知不觉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我休息了,他还要在那只赤膊灯泡下学习。我第二天一早起来,只见他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又伏在桌子上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睡的,他笑了笑说:“不算晚。不想出几条缩小穷富队之间差距的措施,睡不着呀!”然后,他翻出一大堆笔记本,说,根据许多座谈会上的意见,概括了这么几条。第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今后都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到这些穷队去,帮助他们端正路线,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同时,要对富裕队进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富裕队出来的干部,不能只想到本队的利益。第二,要支持穷队在以粮为纲的前提下,搞好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可以有计划地把蚌珍珠、蘑菇、出口鸡等副业项目,放一些到穷队去,这样缩小差距才快。第三,充分运用大队的积累,支援穷队发展生产。譬如有的生产队没有仓库、场地、大粪池,大队就应该帮他们搞起来。有些农机买不起,可以由大队购置,借给他们使用。水不利,路不通,桥没有的,大队应统一规划,帮他们出一把力。总之,首先要帮助他们改变生产条件。当然,还要教育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不能依赖。第四,对一些收入水平特别高的生产队,比如说平均每人已超过两百元的,应当学习大寨的经验,适当稳定下来,不能再年年提高百分之几了。收入增加了分配不增加怎么办呢?可以考虑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增加一些按需分配的因素。

明其一口气说了四条,而后又换了口气说:“但是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我们的同志心里经常想着这个问题。如果心里想不到要缩小这种穷富队的差别,那就不会有相应的措施跟上去,长期下去,对整个集体经济的发展,将会起一种阻碍作用啊!”

“怕就怕胸中没有明天”

一天,明其同他蹲点的彭赵大队几个干部约好,要共同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我和明

其刚走进大队办公室，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振新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队有一些办不到的事情要求大队来办，过去我们大队想办也无能为力，现在有些条件了，你看怎么办？”

我知道，彭赵大队的集体经济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大队一级经济在大队和生产队两级经济中的比重，总收入占百分之六十八，公共积累占百分之八十六，固定资产占百分之七十四。大队一级每年都有二十八万元左右的公共积累，大中型农业机械绝大部分是大队所有的，八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比较平衡的。去年三秋前，在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修订远景规划的时候，干部和社员要求进一步发挥大队一级经济的作用，以提高公有化程度。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只见明其从容地说：“大队经济力量雄厚以后，可以办的事情多得很。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要大干快上，但生产队人力、财力、物力有限，矛盾确实不少。比如我们全县有八万亩低产田，都是些‘箱子田’、‘插花田’、‘饿煞田’、‘僵板田’、‘高亢地’，这些田之所以长期改造不好，就是因为生产队力量不够，迫切需要发展大队经济，发挥大队一级经济的作用。”

“就是嘛！”一个大队干部听出味道来了，冲着明其说：“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有矛盾。现在往往是一个生产队买一套，结果，有的用不了，有的不够用，机器的效用不能充分发挥。如果大队有了经济力量，就没有必要让生产队去各搞一套，十个生产队只要统一置办七、八套就可以了。”

“机耕路、排灌站和地下渠道的建设，也有这个问题，如果生产队各自搞一套，土地要多占五分之一，而且不合理，影响将来大队统一规划。”另一个干部又补充了一点。

“你们说得都有道理。”明其的情绪同他们融合在一起了：“你们可以向方泰公社向阳大队和你们公社的邓桥大队学习嘛。”

被他这样一说，我也顿时开了窍。

向阳大队，从一九七一年大队经济壮大后，连年办了五件事：一，大队建立了一支拥有三艘拖轮、八十吨驳船的专业运肥队伍。二，大队投资建造了二百多平方米的种子仓库和三百多平方米的水泥晒场，还配备三名老农负责保管全大队的粮食种子。三，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大队先后购置了十一台机动喷雾器，一机配备一人，建立了大队植保组。四，成立了一个农机修配站，统一经营和调度中型拖拉机、插秧机、清扬机、中耕机、收割机等。五，从一九七三年起，大队补助生产队新建猪棚五十四间，建棚时，由大队统一规划，将几个队的猪棚连接在一起。明其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非常赞赏的，认为这是把大队积累用到了刀口上，使生产队的职能逐步转移到大队手中，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

邓桥大队是马陆公社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一个大队。一九七五年，后季稻百分之九十七是机插的，麦田开沟百分之百是机器开的。他们所有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全部是由大队经营的。去年三秋时，全大队的劳力就围绕着拖拉机、收割机、盖麦机、开沟机等，组成了十几个专业队，工效分别提高了几倍到几十倍。当时，明其曾亲自到那里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开端，是开始实行农业新的分工。随着农业机械化

程度不断提高而出现的这种新的分工，必将使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虽然这仅是开端，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从这里可以看到，大队经济的发展，是有着光明灿烂的希望的。我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种已经面临着的新的形势。

向阳大队和邓桥大队的经验，彭赵大队的同志听明其讲过多次，他们是熟悉的。就是在明其向他们一再宣传以后，最近半年中，彭赵大队由大队投资、每两个或三个生产队合在一起经营的畜牧场正在建造起来，全大队统一经营的种青队（即负责在全大队水面上种植供应各饲养场的青饲料）成立了，积肥运输专业队扩大了，大队种子队和种子仓库也筹建起来了……现在，听明其又一次提到向阳和邓桥，大家又在想如何再利用大队的经济力量，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

此刻，屋子里静极了，只有煤球炉上的水吊子发出“扑脱扑脱”的声响，但大家都被明其的话吸引住了，默默地听着、思考着，谁也没觉察到炉子上的水已经开了。

明其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道：“我感到，现在更成问题的是，我们有些同志，工作只看到今天，不想想明天，头脑里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三级经济比重这个数字；本子上什么都记，就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如何进一步向前发展，以便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不考虑；开会时什么都讲，就是如何从根本上避免集体的两极分化，真正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不大讲。在我身上，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两年前，我在新泾大队和他们一起制订的那个远景规划，现在看起来，远中就不远嘛！”

新泾大队原来是全县的“小弟弟”，有人曾比喻是“雄鸡落在井底里，啼破喉咙飞不起”。一九七三年春的一次常委会上，明其主动要求到新泾去蹲点。在那里，他走东村，跑西队，作了大量调查研究，搜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和那里的贫下中农一起，亲手画出了新泾大队第一张远景规划图。现在，新泾终于从“井底里”飞起来了。人家佩服的事，他现在怎么倒检讨起来了呢？我简直不理解。原来，明其是这样想的：“新泾大队远景规划中有一条，到一九八〇年每个生产队要有‘十样机’。这种规划是一种没有发展的眼光的反映。因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在发展的，如果每个生产队都有‘十样机’，那末将来只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我恍然大悟起来——两年前看起来很先进的事，过两年再回头看看，有的变得落后了。然而明其同志说，不过这样的落后还不是坏事，因为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规划好。发觉落后了，说明我们的思想提高了。怕就怕不知道这样的落后，怕就怕胸中没有明天。

“你知道嘉定的明天吗？”

这是明其生病住在医院里时给我讲起的一件事：

朱桥公社有个朱桥大队，去年养猪达到了每亩地二点二头，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肥猪上市了二千二百多头，禽蛋上市四万六千斤。这个大队地处朱桥镇的周围，地少人多，能给市里提供这么多副食品，真不容易呀！

一提到养猪、养鸡、养鸭，有的地方不是喊没有饲料吗？朱桥的经验，就是收、捞、养、

种、综五个字。收，人家一把火烧掉的两壳（油菜壳、麦壳）一芒（麦芒），他们都搜集起来，粉碎以后作粗饲料。捞，一年四季捞水草，先捞远的后捞近的。养，主要是三水一绿（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和绿萍）。种，一年四季大搞插种，无论是油菜、麦子、蚕豆、棉花，或者是田岸、渠道、河边、路旁，只要有空隙，他们就插种饲料菜。综合利用的名堂也很多，鸡棚里扫出来的粪，同木屑拌在一起，发酵以后是一种很好的猪饲料，据说还能防治白痢呢；粉丝厂的下脚、水浆，又是精饲料中的好饲料……你看看，这些门路，什么地方不存在呢？只要开动脑筋就是了。

正因为他们猪养得多，肥料就多得用不完，分配给他们的化肥，常常是让给人家去买的。现在，他们的设想又发展了，支部书记徐秀娟同志说，今年的饲养量、头重量还要提高，而且还打算办一个肉类蛋品加工厂，直接搞腌肉、火腿、肉松、皮蛋、油脂，支援大城市。

明其谈到这里，从枕头底下翻出一个小本子，叫我替他算几笔帐：

一个大队一年提供了四万六千斤禽蛋，我们全县二百四十三个大队总共该多少？

一个大队一年交售二千二百头肉猪，全县该有多少头？

我一笔一笔算给他听了，他记到了自己的本子上，然后又高兴地说：“是嘛，郊区为城市服务，郊区的农村应成为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副食品基地，我看是完全做得到的。朱桥大队的标准可能太高，我们就打个对折计算吧，每个大队每年上市一千头肉猪，二万三千斤蛋，毛猪每头按一百五十斤计算，全郊区一年就是近三亿斤肉，六千五百多万斤蛋，差不多全市每人每年可以吃到五十斤肉，十多斤蛋了。”

他似乎怕我不相信，还特地从本子上翻开了另一个资料给我看。上面这样记着：

娄塘种畜场自动化养鸡场。

饲养量：五万只。

日产蛋：三万只，每斤八至九只，合计三千多斤。

劳动力：一百人。

自动化项目：饮水、喂料、除粪、拾蛋、装箱。

土建任务：五层百米长大楼一幢。

“这是真的吗？”我惊喜地问。

“当然是真的！房子已经造好了，全套自动化设施已搞成了小样，正在放大安装。”明其说，“当然这还是一种试验。目前我们主要还是依靠集体，发动群众，养更多的鸡。”

我笑了，他更兴奋起来：“你可知道嘉定的明天吗？大寨的贫下中农，手里干社会主义，心里想共产主义，想得远才干得欢啊！”

明其的话，使我想起了许多。平时，我经常听到明其讲规划，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心里要有阶级斗争这个纲，心里要有共产主义远景图。”这时，我想起了有一次跟他在彭赵大队劳动回家时的情景：

那天，我跟明其在一个冬春实现了“七个一”[注]的彭赵二队劳动，收工时，已是暮霭笼罩了。回县革委会的路上，明其也先是这样问我：“你知道嘉定的明天吗？”然后他滔滔地

说：

“去年我们已经订了一个规划，现在看来，又需要修改、补充了。暂且把一九八〇年算作第一个明天的话，那末，到那时，我们嘉定县农业大学第三届学生该毕业了，各公社办的业余农大也至少有两届毕业生了。这样，我们全县每个生产队都有了大学毕业生。加上生产队政治夜校还要进一步办好，我们的农民就可以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逐步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了。

“到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也不同于现在了，‘两深三肥四弯腰（深耕、深沟，积肥、运肥、施肥，拔秧、插秧、耘耩、收割）的问题该完全解决了，电子化也要尝到些甜头了。你别笑呀，这是真的，马陆公社去年机器插秧面积已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机器拔秧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机器收割就更不用说了，麦子百分之五十，早稻百分之三十，后季稻百分之五十。开沟去年已经化起来了。耘耩机械化，问题也不大了。现在正在攻克的是机械化的室内育秧和场头作业的全套自动化，好多个工厂和科研单位都扑在上头研究了，还怕攻不下来？

“到那时，集体积累至少要占百分之十五以上，社员收入平均每人二百三十元。

“到那时，社队工业的规模还要翻一番。现在，虽然有五个公社社一级积累每年已超过二百万元，但还有三分之一的公社不到一百万元。大队一级更不平衡，有四分之一左右边远偏僻的大队，基本上还没有工业。从现在起，我们要把发展社队工业的重点放到这些地方去。照我的想法，到一九八〇年，基本上做到全县平均每一个农户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劳动力在社队工业中工作，那样子，三大差别的缩小才有希望呀。”

说到这里的时候，明其特别兴奋，还把《共产党宣言》上的一段话背诵了一遍：“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我突然觉得眼前开阔起来，心里想：私有制出现以后，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是对原始公社经济的工业和农业直接结合的否定。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业和农业又重新结合起来，这又是对工业和农业分离的否定，这是更高阶段上的否定呀！……

明其讲起未来的远景特别兴奋，也特别严肃。他经常说：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决不是平坦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始终存在。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候，如果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就要走到邪路上去。每一次听明其讲嘉定的明天，我总是沉思：为了共产主义，我们不仅要同大自然进行勇敢的斗争，更要同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国际上的反动势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啊！

此刻，在嘉定县人民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我又被明其同志心胸中的灿烂明天鼓舞着，振奋着。

【注】“七个一”即：筑好一条路，开好一条河，平整一片高亢地，造好一幢农民新村，造好一个大队饲养场，筑好一段地下渠，建立好一个种子仓库。

为城市人民多养鱼

——嘉定县城东公社水产队的调查

嘉定县城东公社水产队有五十六户，二百二十七人，一百五十个劳动力，经营河沟水面一千八百四十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水产队在公社党委领导下，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调动了广大渔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鱼产量逐年上升，上市量不断增加。一九七五年产量达三千二百八十六担，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平均亩产一百八十一斤。这一年，上市鲜鱼三千一百六十八担，为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二。

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城东公社境内河流密布，有良好的养鱼条件。但在一九七二年前，鱼产量却长期在二千五百担到二千九百担之间徘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本原因在于路线没有端正，丢掉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前几年，队里办了个小工厂，干部认为，工厂利润高，又省力，渔业生产收入低，又辛苦，因此，就把主要精力放在采购工厂设备，接洽加工任务上，从而放松了对渔业生产的领导。结果，队里滋长了资本主义倾向。一部分渔民在坏人煽动下，私人养鸡鸭成风，把集体的鱼拿来喂鸡喂鸭，热衷于跑集市贸易，使集体渔业生产受到影响。正如贫下中渔尖锐批评的：不抓阶级斗争，不是全心全意为城市人民服务，而是围着钞票打转转，这样，方向道路偏了，资本主义泛滥，生产哪能上得去？在公社党委领导下，水产队的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明确了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才能把渔业生产搞上去。

水产队党支部发动渔民狠狠批斗了阶级敌人偷盗集体的鱼和煽动社员私捉私卖等破坏集体经济的罪行，并组织渔民开展回忆对比活动。老渔民戴金贤说：“在旧社会，渔民住的是破船，用的是破网，穿的是破衣破鞋，吃的是麦粞饭，队里百分之七十的老渔民讨过饭。那年头，真是‘小船一只到处漂，吃饭穿衣无依靠，到处流浪受人欺’呀！解放后，渔民翻身做主人，走上社会主义金光道，我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痛，再走个人发财的资本主义回头路。”

路线端正了，人的精神面貌就大不相同了。广大渔民自觉地不搞小生产，一心一意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兴起了比干劲、比贡献、比继续革命的热潮。冬天渔汛期间，为了保证增加鲜鱼特别是活鱼的上市，在队干部的带领下，全队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连续奋战十几

个昼夜。尽管北风呼啸，河水结冰，渔民们还是赤脚下河捉鱼，手脚虽然冻得发麻，干得却是热气腾腾，把活蹦活跳的鱼一条条捉了上来。老渔民戴弟生已经七十一岁了，还抢着摇船、下网，别人劝他休息，他却高兴地说：“为城市人民服务，这是我们渔民的光荣职责，只要工人老大哥能吃到鱼，再辛苦也高兴。”过去，螃蟹生产季节，晚上捕蟹一般只捉一个潮期就回来了，现在为了发展集体生产，满足城市人民需要，渔民宁肯整夜不睡守在河边，涨潮和退潮二个潮期都不放过。在广大干部和渔民的努力下，产量连年上升，一九七三年鱼产量突破三千担大关，一九七四年达到三千一百零五担，一九七五年进一步增加到三千二百八十六担。

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渔业农业相互促进

水产队的一千八百十四亩水面，分布在全公社范围内，经常要同生产队发生矛盾。过去，公社党委认为，抓农业已经够忙的了，哪里还有精力抓渔业。水产队干部也存在着“鱼养在河里，粮食种在田里，黄牛角，水牛角，各管各”的思想。但是，实际上渔业农业之间的矛盾却不断发生。有时，生产队要大搞冬季积肥，把河水车干挑河泥，鱼当然也就遭殃了；生产队发展养猪，大量种植水花生、水浮莲和水葫芦，水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三水”作物，养的鱼长不大，成了头大尾小的“妖怪鱼”；有的生产队为了要吃鱼，捉了水产队养的鱼，渔民捕鱼，也踏坏了生产队种在河边的庄稼，拉断了放养水花生的拦绳，这些纠纷经常要闹到公社里去。

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公社党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要实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教导，认识到发展农业是发展渔业的基础；发展渔业既不占用农地，又能蓄水保粮，而且可以为农业提供肥料和积累资金，二者都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只要处理得好，就能相互促进。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公社党委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切实加强对渔业生产的领导。他们对水面统筹兼顾，合理安排，认真落实水面政策。例如，把水面宽而又相互串通的一千八百十四亩河沟划归水产队经营，其余零星的圆沟、坑塘、断头浜等八百多亩水面划给农业队养鱼，这样既使水面得到充分利用，又使农业队的社员可以吃到更多的鱼。公社党委还规定种植水生饲料时要留下一定的水面，便利鱼类生长；车浜积肥事先通知水产队，先捉鱼再挑河泥。由于认识统一，步调一致，水产队和农业队相互支援，渔农关系得到了改善，渔民农民之间的团结也进一步加强了。

水产队经常从各方面主动支援农业。每年农业大忙季节，水产队把运输的拖拉机腾出来为生产队耕地，组织渔民参加抢收、抢种、平整土地，每年累计有一、二千个工作日，去年一年多达二千三百多个工作日。水产队还利用每年冬春鱼种塘清塘的时机，主动把水车干，让农业队挑河泥沤肥；喂鱼有多余的猪粪、粪肥，支援生产队，去年一年达三千多担。

广大贫下中农也同样经常派出劳动力支援水产队发展渔业生产。例如，水产队分散在全公社河道的七十二条渔箔，除四条较大的渔箔派渔民专门看管以外，其余的都由附近

的生产队代管。每逢台风季节，贫下中农不避大风暴雨，坚持巡视，发现渔箔损坏立即通知水产队来修理。在渔汛、蟹汛期间，民兵还积极协助水产队护渔。去年三次渔业生产旺季，全公社各大队共出动民兵巡逻达一千五百多人次。到了夏天，水生作物封住了水面，农业队主动捞掉一部分，以便空出部分水面，利于鱼类生长。

由于党委重视，正确处理了渔农矛盾，渔业生产不断发展，水产队的集体经济也日益壮大。水产队成立十五年来，上交公社的集体积累达二十一万六千元，有力地支援了农业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我们公社水产队，支援农业牢记心，积累资金买农机，多为农业出力气。”

坚持自力更生，开展科学养鱼

城东水产队积极开展河沟放养为主以后，开始时，鱼种全部依靠采购，不但成本高，而且品种不合要求，质量没有保证。能不能自己培育鱼苗呢？有的同志说，“四大家鱼”的鱼苗历来靠长江捕捞，还没听说过可以人工孵化。有的同志却认为家鱼既然能在湖泊产卵，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条件，让鱼在池塘中产卵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水产队干部和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组成三结合的科学养鱼实验小组，开始搞家鱼人工孵化的试验。没有经验，向兄弟单位请教；没有产卵池，土法上马，自己修建；没有亲鱼，就捕捞大鱼进行饲养。一九七一年，他们实现了花、白鲢和草鱼的鱼种自给。现在，青鱼的人工孵化也取得了成功。

近几年来，生产队利用水面大量种植青饲料，这对花、白鲢等上层鱼生长极为不利。但鳊鱼、鲫鱼、鲤鱼生活在水底层，影响较小。水产队就人工孵化鲤、鳊、鲫鱼等下层鱼种，扩大这些下层鱼在混合放养中的比例。并且从过去只放养草、青、白鲢、花鲢四大家鱼，增加到放养鳊、鲤、鲫、东北鲫鱼、非洲鲫鱼、河鳊、蟹等十二种；从放养中、上层鱼为主发展为放底层鱼为主。近三年来，每年培育花、白鲢、草、青、鳊鱼种共一百八十万尾以上，不但满足了自己和本公社农业队养鱼的需要，还可以支援兄弟公社。为了节约粮食，他们还大量养猪，用猪粪肥水繁殖浮游生物，效果比吃粮食精料要好。过去培育一万尾鱼种需精料五百斤，现在只要一百三十斤就够了，每年可以节约粮食七万斤。这样，每万尾鱼种的成本也从一九七一年的七十元，降低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七元。而过去靠向外采购鱼种则要二百五十元，单是自育鱼种一项，每年就可节约四万元以上。广大贫下中渔高兴地说：“为革命养鱼记心上，科学养鱼道路广，自力更生力量大，渔业生产大变样。”现在，水产队党支部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向贫下中渔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继续提高河沟养鱼产量的同时，进一步建设稳产、高产的精养鱼塘，不断提高单产水平，为城市人民生产更多的鲜鱼，用实际行动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

《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编写小组

计划·价格·思想工作

——蔬菜购销工作札记

上海市蔬菜公司
杨家桥购销站 做价员 杨计法 梅国庆

我们做蔬菜购销工作，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就是如何使季节性很强的蔬菜均衡上市，保证城市人民对蔬菜数量、品种、质量的要求。本来，国家通过蔬菜公司和生产大队制订的计划，就规定了种植数量、品种，以及上市时间，等等，因此，只要保证计划的实现，这个矛盾就应当可以解决了。记得十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听别人说：“不要把蔬菜生意看得太复杂，说到底不过是个价格问题，价格做好了，矛盾也解决了。”似乎我们的工作，只要每天在购销站里等生产队运销员送菜来，照章做价，然后让菜场采购员收菜付钱，就行了。

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几年，蔬菜上市数量大起大落的现象一直难以克服。上市数量过多，菜场卖不掉，就要当饲料返销给生产队，造成浪费；上市数量过少，又不能满足城市人民的需要。过去我们认为自己只管做价，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能为力。去年，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始认识到，蔬菜的产、购、销，虽然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但是，由于我们蔬菜公司（全民所有制）和生产队、菜场（集体所有制）是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实行的是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仍然起着作用。如果我们不是正确掌握价格政策，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就会让价值规律破坏计划经济。而我们的做价工作搞得不好，实际上是一个被价值规律牵着鼻子走，还是由我们来掌握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只有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才能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为计划经济服务。

因此，我们觉得，做价工作对保证蔬菜均衡上市的关系很大。例如：过去，我们蔬菜公司针对蔬菜生产季节性较强的特点，实行“看时调价”（即蔬菜刚上市和将落市时，因产量低，成本高，适当提高价格；到了旺季，产量高，成本低，适当降低价格），这是兼顾了国家、

集体、消费者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也是适当地运用价值规律，调节蔬菜供求情况，使旺季上市量不过多，淡季保持必要的上市量，努力做到均衡上市。但是，如果不适当地强调了价值规律，如象过去有个时期，我们就价格做价格，单纯靠价值规律来调节上市量，结果，“看时调价”，却在客观上起了助长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消极作用。有少数生产队运销员摸到了我们调价时间和幅度的规律，趁我们调低价格之前尽量多上市，调高价格之前尽量少上市或者不上市，结果造成调价前后蔬菜上市量大起大落，因而冲击和破坏了计划经济，这种情况不是同我们做价工作很有关系的吗？

从这一事实中，使我们认识到，做好蔬菜的做价工作一定要坚持计划第一。离开了统一的计划，把“看时调价”当作单纯的业务工作去做，就会被价值规律牵了鼻子走，就会走偏方向。有一次，我们和生产队运销员、菜场采购员一起议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三个员，不能各坐一条小板凳，各打自己的小算盘，而必须同坐一条大板凳，共打“为城市人民服务”这个大算盘。思想统一以后，大家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统一的计划指导下，努力做到均衡上市，把过去的单纯买卖关系，逐步地改变为相互关心、主动分担困难，很快地在工作上出现了新的面貌。例如：做价员和采购员经常下生产队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一起落实蔬菜的生产和上市计划；运销员也经常到菜场了解居民的意见和要求，搞好蔬菜种植和上市工作，尽量满足城市人民需要。有一次，李子园大队听了菜场第二天还少二十担菜，他们虽然已经完成了上市计划，还是连夜把正在看电视的四十多个社员动员起来，突击收菜，及时送到菜场。有时，蔬菜上市量多了，菜场党组织向营业员交底，动员大家安排营业时间，下里弄推销，显著地减少了积压浪费。

二

在蔬菜购销工作中，我们做价员和生产队运销员、菜场采购员的袋里，都有一本《蔬菜分等定级规格质量标准》，里面详细地记载着七十八种蔬菜的等级标准。这些标准都是经过我们三员共同讨论、制定的，按理说是兼顾了生产、批发、零售三个方面的经济利益。因此，只要照本执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实际上，任何一种规定都是要靠人去执行的，如果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两年前，我们负责搞真建大队和光新路菜场的做价工作。经常遇到运销员和采购员之间为了定等级产生不同意见，要我们出面去当裁判，多的时候一天有十多次。有一天，真建十二队送给菜场八百多斤香葱，运销员认为按照标准应定甲等，菜场采购员从里面抓一把，认为长度超过了标准，应定乙级。等到要我们表态时，我们先说甲等，运销员高兴了，

采购员批评我们“不执行制度”；我们听了后，改口说定乙级，却又遭到运销员批评，说我们“死扣标准”。结果，争执不下，从晚上六点多钟一直拖到九点。这时，我们也火了，就说我们做价员有权做价，免得“挑着鸡蛋爬山，两头都怕碰”，就定了个乙等价（打八折）。但事后细想，我们虽然有权决定价格，但这一次和运销员的相互关系没有处理好，会不会影响生产队按计划送菜上市的积极性呢？我们越想越觉得不安，第二天就到生产队去找他谈心，没有谈拢；第二次再谈，也没谈成。第三次，我们和联络员一同到生产大队去，得到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支持，大家在牛棚里促膝谈心，我们对自己的简单化工作作风做了自我批评，才解开了思想疙瘩。

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认识到，规章制度订得再详细再合理，也包括不了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拿香葱的质量规定来说，制度规定甲等不得超过一尺二寸，但实际上香葱有好几个品种，有的比较粗壮，即使超过一尺二寸，仍旧保持香、嫩，有的虽然很细很短，却显得香味不足。再加上时令的不同，对香葱质量的要求更加多了。简单地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就一定会有不合理，一定要碰钉子。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是鼓吹要建立“严格的制度”去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吗？如果我们上当受骗，照着他的一套去干，那就必然伤害群众积极性，破坏社会生产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对我们做价员、运销员及采购员来说，要政治挂帅，就要牢固地确立为城市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为了做好蔬菜分等定级的工作，我们和运销员、采购员一起，经常到田头去讨论确定蔬菜质量等级。去年夏天，番茄将要上市，我们发现质量标准不完全符合实际，就组织运销员和采购员到真建十二队开田头会，讨论如何掌握番茄色度，确定等级。黄瓜上市时，发现掌握嫩度有困难，就一起到祁连六队去讨论。这样的现场会，去年一共开了七、八次。由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讲为革命种菜，支援城市供应光荣的道理，因此，不仅统一了质量标准，而且根据城市人民吃菜的要求，努力做好生产、运输、保管工作，提高蔬菜质量水平。例如，真建十三队有一次上市的番茄皮色红度不够好，原来要定乙级，但考虑到当时连日阴雨，日照较少，又因番茄内在质量较好，便改定甲下级，大家都心服口服。以后，这个大队送到菜场的蔬菜都严格执行质量要求。有一次送来一批韭菜，按规定可以浇水，运销员为了保证质量，宁愿减轻重量也不浇水。菜场采购员看了这个情况，主动提出“不能让生产队受损失”，按照甲等计价。象这种情况，是只能通过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才能出现的。

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喜尝试

——话剧《盛大的节日》笔谈会

编者按：由上海话剧团编导、演出的话剧《盛大的节日》，在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作了可喜的尝试，取得了初步收获。最近，本刊约请有关同志进行笔谈。他们在肯定这个剧本的同时，也对剧本提出了各种意见。编导和演员介绍了他们的创作体会。这样的讨论，对于剧本的进一步修改，对于文艺创作怎样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深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特别是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益的。

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的变化

上海儿童艺术剧院 任德耀

话剧《盛大的节日》是一出从正面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戏。它再现了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掀起一月革命风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全剧描写了上海机车修理总厂以铁根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派严函的艰苦曲折的斗争过程，展现了广阔的斗争画面。这是在革命样板戏经验带动下，话剧革命迈出的可喜的一步。

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塑造主要英雄人物，这是《节日》的一大特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在革命高潮中，各种社会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阶级关系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节日》没有把矛盾冲

突和人物关系简单化,而是以英雄人物为中心,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和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节日》中的严函就是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剧本努力从纵、横两个方面刻划了严函的阶级本质。他名义上是总厂的党委书记,实际上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屡犯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坚持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必然演变为党内走资派。剧本还描写了他的多方面的社会联系:他是铁根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死对头,文化大革命前极力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扼杀工人群众首创精神,文化大革命中又疯狂进行反革命围剿,实行白色恐怖。他是混进党委内部的叛徒乔子慎的保护人,是阶级异己分子卞希熊的靠山。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诸如那两位资产阶级的反动剧作家和教授,也都聚集到他的周围来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恨。而在他的上面,不但有部里的走资派,更有一个总后台、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挂帅人物——刘少奇。当刘少奇还在台上,严函就神气十足,猖狂已极;刘不上天安门了,严就慌了手脚;刘被批判了,严就慌忙组织退却;刘倒台了,严在上机厂的阵线也就随之土崩瓦解了。这些上下左右的人物关系的描写,表明严函不是抽象的一个人,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可以看出,作者是力图通过无产阶级同严函的斗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的。

随着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的激化,每一个人都要在这场斗争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各种矛盾也都激化起来。我们从剧中看到,铁根同他的战友们贴出了全厂第一张革命大字报,走资派严函和叛徒乔子慎,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镇压群众运动。受到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影响的厂长石陆成了他们的追随者,而厂党委副书记井峰则坚决同革命派站在一起。党委内部的斗争激化了。围绕着这场斗争,在群众中间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作者颇具匠心通过老工人江火龙一家家庭关系的变化,来反映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一家,在江火龙的小女儿、铁根的未婚妻江兰的眼睛里,“原来多么欢乐幸福”,现在却“四分五裂”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这个工人家庭中。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铁根、江火龙和他的大女儿江秀、儿子苗苗,他们“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代表着工人中的大多数,代表着工人队伍中的左翼;而江秀的丈夫丁志良,由于被资产阶级法权和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迷了心窍,已经成了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工人贵族,不想革命了,他代表着工人队伍中的少数右翼;而象江兰,则动摇于两者之间,但革命迫使她迅速作出抉择。在这里,不存在抽象的夫妻、姐妹、翁婿等等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只能是阶级关系的反映。在路线问题上,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没有调和的余地。

这种阶级关系的大变动,使铁根不能不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不但要同走资派严函、叛徒乔子慎斗,要同工人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斗,要同成了保守组织头头的丁志良斗,而且,有一些原先同他的关系很密切的人,现在也起来反对他,包括在童年时代一道受资本家的压迫,现在却不问政治、迷失了方向的未婚妻。有时,甚至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也

会同他发生冲突。这里矛盾的性质各不相同,有的是敌我矛盾,有的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分歧,有的则是对阶级关系的变化一时认识不清楚而产生的思想上的差距。而对这种复杂的情况,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地位的铁根,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从而团结大多数,把斗争的目标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身上,这确实是一个扣人心弦的问题。作者为铁根设置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就为铁根形象的塑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见,只有深刻揭示阶级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使英雄人物更丰满、更深刻地树立起来。

《节日》描写上述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关系和矛盾冲突,当然不是不分主次地并列着的。所有这种种的矛盾,都是由无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这一个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着的。丁志良为什么同铁根闹对立?因为丁是被严函所收买、利用和挑动的。从石陆到江兰,所有出来反对铁根的人,根子都在严函身上。这样,《节日》在描写其他各种矛盾冲突的时候,都使它们服从于一个目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来更深刻地揭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派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冲突,写前者正是为了写后者,后者始终是贯穿全剧的主要矛盾线索。所以尽管全剧的结构是庞大的,但主线依然是很分明的。这样的处理显然是符合生活中阶级关系的特点的。

通过一个工厂、一个家庭人物关系的变化,反映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的变化,这是《节日》的成功之处。是否可以这样说:凡是剧中写得比较深刻的地方,总是对阶级关系的揭示较有深度的地方;而有的部分,特别是戏的后半部分,之所以比较粗浅,就是因为只罗列了事件、现象和过程,而没有把戏的前半部已经展开的阶级关系继续开掘下去,这就影响到戏的思想深度,也影响到英雄人物的思想深度。

对严函的阶级本质的揭露,剧本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节日》比较集中地揭露出严函推行资反路线,制造白色恐怖的种种罪行,这些罪行固然令人痛恨,但是,象严函这类走资派,其反革命策略似乎还应更阴险毒辣一些。刻划这类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典型,更重要的是深刻揭露他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剖析他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揭示他之所以演变成为走资派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节日》在这方面多数是作为一种背景介绍,显得比较薄弱。

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英雄人物的关系

上钢五厂 辛志海

《盛大的节日》中铁根这个人物的塑造,基本上是成功的。

铁根的起点比较高。他第一次在大字报前面同严函作面对面的斗争,就已经是一个

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铁根的思想就不能有发展、有飞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会不断给予铁根以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正如铁根自己说的:“这是阶级斗争大学呀!”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铁根对走资派的认识,对这场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有一个不断地深化和提高的过程。我觉得,《节日》要是能更深刻更有层次地写出铁根思想发展的过程,就会使这一英雄形象更丰满、更有深度。而现在的演出本里还写得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一弱点呢?我想这是由于戏里对党的领导作用体现得不够充分的缘故。

反映和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塑造铁根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形象,一定会涉及到一个如何体现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运动,它始终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象铁根这样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党培育和造就的结果。没有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铁根这样的英雄人物。铁根同丁志良都生活于工人家庭,为什么在政治上、思想上有这么大的差别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丁志良在思想上背离了党的路线,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而铁根则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接受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个工人的头脑里是不可能自己长出马克思主义来的,要靠党来灌输。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产生工联主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才能成为真正自觉的革命运动。这是一百多年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包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反复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象《节日》这样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大型作品,要体现党的领导作用,途径是多方面的。作者有意通过《十六条》、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中央贺电这三个历史性的文件,来体现这场伟大的革命始终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是值得肯定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往往直接传达到群众,这是党领导整个运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如何更深刻地表现出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在英雄人物思想发展中的影响以及对他的行动的指导,剧本就体现得比较模糊,这就使党的领导在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有所削弱。

另外,党委副书记井峰的形象,也应该体现这种领导作用。《十六条》指出:我们党内有不少领导干部“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根据《节日》中的描写,井峰就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自觉地坚持继续革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象这样的革命领导干部,为什么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呢?井峰作为一个自觉的党的战士,他的高度的党性要求他在运动中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把群众运动引向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轨道。过去,井峰同严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更应该站出来同严函进行斗争。剧本第二场,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井峰从外地回厂,只让他同严函简单地争论了几句就收场了,这是很不够的。在同铁根的关系上,他作为一个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老战士,应该比铁根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应该用自己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来帮助铁根,引导铁根。这样做,会不会抢

铁根的戏呢？只要处理得好，这两个英雄形象完全可以相得益彰，交相辉映。《节日》的序幕，井峰不就启发铁根要沉住气，认真地看一看，想一想吗？第三场，井峰在造反派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支持铁根，用自己的革命经历和“跟资产阶级斗上几个回合”的决心教育和鼓舞铁根，就很感人。而在这场戏中，让井峰仅仅提出参加造反派，就低了。特别是第九场，井峰居然在关键时刻会反对铁根回厂做丁志良他们的工作，实在是个败笔。这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也有损于他的英雄形象。他完全应该理解，在这种关键时刻，铁根应该去，也必须去。他应该比别人更深刻理解并坚决支持铁根的决心和行动，这样处理将会使两个英雄形象更光彩。

揭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 阶级和思想根源

江南造船厂党委副书记 齐兰洲

《盛大的节日》中，铁根和江火龙帮助教育厂长石陆那场戏，对我们一些执行过刘少奇反动路线、犯过走资派错误的老干部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石陆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运动的阻力。后来在党和工人革命造反派教育帮助下，才逐步转变过来。这一过程，概括了我们相当一部分犯过走资派错误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为什么在民主革命时期“拚过刺刀，炸过碉堡”的石陆会犯走资派错误呢？剧本告诉我们，一个原因是，全国解放后，石陆的思想却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上一是没准备，二是不理解。另一个原因是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缺少一个共产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不想继续革命了。工人批评他是“二三百元一幢楼，汽车沙发样样有”。他却乐在其中，还把心思、爱好放到了古董古画上。资产阶级的教授、剧作家成了他家的常客，而工人群众和老战友却“不大上门了”。石陆错误地认为，“情况在变化，靠过去那套政治动员、‘两忆三查’不行了，要跟上市时代，领导工业化得拜人家洋包子为师”，因而就成了修正主义的俘虏。

由于剧本努力揭示了石陆这样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阶级和思想根源，因而对于我们确实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从进城后，由于放松了思想改造，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如对民主革命那么积极，曾经躺在功劳簿上算等级账，欣赏薪金制、军衔制，生活上也贪图安逸，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一资本主义的旧土壤，象石陆那样，认为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了。这就势必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很感兴趣，而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反而格格不入了。如果没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真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应该不断

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战士，做同走资派作斗争的自觉战士。

《节日》对石陆的思想写得比较深，对他的转变处理得似乎局促了一点，不够细致，缺少一个合情合理的过程。铁根和江火龙将石陆在“鞍钢宪法”上写过“含意不清，暂不执行”的材料一抛，说他对抗毛主席，石陆一下子吓呆了，也就转变了。其实，思想上的震动和转变还不是一回事。就拿我来说吧，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派为了帮助我，多次和我谈心，启发我的阶级觉悟，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和我一起学习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才使我逐步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才逐步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

石陆的转变之所以显得局促，可能与这个戏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揭露得不够充分有关系。戏里虽然也写到了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恶果，但对党内资产阶级篡夺我们工厂企业领导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稳固等问题，揭示得不够深刻。因此铁根批评石陆“替资产阶级掌权”，就显得比较概念，石陆对自己在十七年中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也缺乏足够的认识，他的转变自然就比较生硬了。

一个感人至深的场面

《朝霞》编辑室 姚 真

《盛大的节日》中，第三场特别感人。作者用欲扬先抑的手法，为铁根设计了一个矛盾重重的典型环境。走资派严函对铁根施加重重政治压力，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扼杀在摇篮里。铁根坚定地表示：“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政治大学，我要在这场阶级斗争中学到底，干到底！”紧接着，有两位老人出场了，一个是老工人江火龙，一个是老战士、厂党委副书记井峰，他们在造反派最困难的时刻，向铁根提出参加造反队的庄严要求。这时，刚在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小将苗苗来了，他也要求参加造反派。苗苗向大家描述着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幸福情景。顿时，舞台上红光照耀，乐声昂扬。铁根的心，江火龙和井峰的心，苗苗的心，以及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一齐向着首都天安门，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场戏深深地感染了我。它写出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热爱，写出了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向着文化大革命。回想起十年前，我们红卫兵战士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烈支持下，造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反。走资派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我们，污蔑红卫兵的大字报满天飞，“小牛鬼蛇神”、“小反革命”的帽子一顶又一顶的压到我们头上。我们有时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甚至受到一小撮暴徒的谩骂、殴打。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受

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钢铁一般的支持。记得一个夜晚，来了几位船厂的工人，他们握住我们的手说：“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感到你们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有一个大学的红卫兵战友，主动帮我们油印了几千份革命传单，散发出去揭露走资派的面目。还记得一次大辩论，走资派挑动受蒙蔽的群众把我们围攻到半夜。我的一位战友向大家叙述红卫兵为什么起来造反，走资派为什么要镇压，并回忆了自己苦难的家史。一些人起哄，要把她拉下来，一位老工人挺身而出，护着她：“让她说下去！她是我们工人的子弟。”走资派压我们，我们报之以蔑视，可是在亲人的支持面前，我们的热泪再也止不住了。

最近听一位同志讲了件事，也很受启发。这同志在运动初期一度受了蒙蔽，担任过保守组织的头头。开始时，加入他们组织的人不少，可是随着毛主席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他们的组织越缩越小，尽管走资派一再用各种办法笼络人心，也无济于事，人们纷纷离开他们，加入到革命造反的行列。这同志的妈妈是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也不同意女儿的观点，她对女儿说：“共产党刚成立时，人很少，几十年中却越打越多；最后解放了全中国，因为共产党手里有真理，受到全中国老百姓拥护。而你们为什么人越来越少呢？可见真理不在你们这一边。”这个问题提得既朴实又尖锐，讲出了深刻的道理。无产阶级革命派尽管开头总是少数，但因为他们的方向正确，路线正确，就一定会得到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支持。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邓小平这个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挂帅人物，十年前伙同刘少奇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十年后又妄图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可是无论在当时，在今天，都是不得人心的。他得罪了大多数，大多数不赞成，不答应。人心、党心、党员之心要求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节日》是对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有力回击。

首要的是参加战斗

《盛大的节日》创作组

怎样在舞台上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波澜壮阔、意义深远的伟大斗争？怎样塑造好与走资派进行奋勇决战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我们在政治上、艺术上水平都很低，觉得有很多难题。怎么办？唯一的途径，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社会真是阶级斗争的大课堂啊！在我们深入工厂、铁路边劳动、边调查的过程中，先后个别访问了六十多位新、老干部，革命造反派战士，当年的红卫兵小将。许多同志满怀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畅谈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及深远意义，不断地支持我们，关怀我们；鼓励我们，殷切期望我们“以革命的激情谱写革命的战歌；投入盛大的斗争，搞好《盛大的节日》”。当他们了解到我们存在着畏难情绪时，亲切而又尖锐地指出：“某些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气势汹汹，疯狂得很，你们写戏歌颂、保卫文化大革命，怕什么呢？应该挺身而出，参加战斗嘛！”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激励了我们的斗志。是啊，如果我们自己不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去参加保卫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伟大的战斗，又怎么可能通过艺术形象来歌颂、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且，创作这样的作品，本身也就是参加战斗啊！

《盛大的节日》这个戏，从深入生活到完成初稿的一年，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并遭到迎头痛击的一年。在尖锐、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中，几乎每天都在考验着我们的立场、世界观和阶级感情。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每次都会碰到站在哪个阶级一边的问题。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向党和工农兵观众交上一份旗帜鲜明的答卷。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交出这份答卷，对我们来说，首要的就是要参加战斗；否则就分不清路线是非，看不清走资派还在走。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的意义的理解，加深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光辉论断的理解；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坚定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的决心，增强塑造与走资派进行决战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责任感；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逐步解决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的问题，提高作品的战斗性。回过头来，我们又体会到创作初期的所谓“难题”，与其说是一些艺术创作上的问题，不如说根本上就是思想、感情和立场的问题。正如鲁迅所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

对文艺创作来说，文化大革命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伟大的宝库。歌颂和反映这场革命，不愁没有丰富的素材，不愁没有尖锐的矛盾冲突，而这场革命，又造就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新英雄人物啊！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能不能象革命样板戏那样，真正做到满腔热情、千方百计。《盛大的节日》距离这一要求还很远，距离准确、深刻地反映文化大革命还很远，作品本身不但还很粗糙，而且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工农兵群众，进一步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继续努力作战，在战斗中修改，在战斗中提高，努力完成时代和阶级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带着对走资派的仇恨 塑造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

上海话剧团 姜际成

我在《盛大的节日》中扮演了铁根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形象。

记得戏彩排后，工农兵观众对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说我演的铁根造反劲头不足，太“稳”了，不象个造反派。原因在哪里呐？我检查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整个表演，感到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己对铁根这样的英雄人物缺乏深刻的认识与感受，因而把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加到英雄人物身上去了。我重新学习了《十六条》，学习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六条》中有一段话：“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我想，铁根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名革命的闯将。“举行了进攻”，就是说，在走资派的面前，铁根应该是始终以主动的进攻的姿态出现的。而进攻的目标，自始至终对准着党内走资派。

要表演出铁根的进攻的精神和气势，靠外在的动作上的夸张是不成的。要找出铁根的内在的东西，也就是他造反的思想动力。

铁根究竟为什么要造反？我的理解，铁根的思想核心就是他对未婚妻说的一句话：“不造修正主义的反，今天的主人，又要重新变成奴隶。共产主义理想就要毁在修正主义者手里。”一方面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一方面又看到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教训，所以他对修正主义者，对严函这类党内走资派怀着阶级的深仇大恨，他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的战士。基于这样的认识，第一场铁根的上场，我就给予他明确的目的，他就是冲着严函来的，就是要揭破严函的假面具，造严函的反。当然，铁根对严函的认识，也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而逐步深入的。

要在舞台上创造一个敢于同走资派奋战到底的英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对走资派恨起来了没有？如果我自己心中没有燃烧起仇恨的烈火，又怎么能演好铁根这个英雄人物？为此，我一面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党的有关文件，一面通过社会调查，了解走资派的种种罪行，特别是通过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的揭发批判，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阶级感情。要演好铁根的英雄形象，就是要把舞台当成战场，带着对走资派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在舞台上同走资派作斗争。原先，我念有些台词比较平淡，但是，当心中激起了对走资派的仇恨的时候，这些台词念起来就感到充实有力了。

演铁根这样的英雄人物，对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都是一次很好的改造的机会。今后我要进一步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进一步加深对英雄人物的理解，加强自我改造，同剧组的同志们一道努力改好《盛大的节日》，使它成为鼓舞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向走资派作长期的不调和的斗争的有力武器！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鲁迅

在祖国的辽阔大地上，大大小小的道路纵横交错，姿态万千。各种各样的路，铺满了历史的风霜，记载着革命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

人们特别难以忘怀的，是江西山区的路。这里的路，在重重迭迭的山峰中腾跃起伏，崎岖悠长。有的横挂山腰盘旋，有的绕上山巅插入云霄，有的顺着幽谷的小溪伸展，变幻无穷。毛主席亲自率领着红军在这些山路上行军过、战斗过，峰回路转，革命的火炬连绵不绝。现在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又踏着当年红军战士的脚印，前进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上。

没有走过江西山区之路的人们，对它是向往的，敬慕的。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是自豪的，幸福的。这里摘录的两封信，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封

亲爱的战友：

我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素不相识，但共同的革命目标，把我们的心系在一起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公司的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将在最近来到你们战斗的地方。我，一个暂时躺在病床上的青年工人，激动的心情无法抑制。我身在医院，心却早已飞到了江西山区，飞到了你们的身边。把老革命根据地的山区农村建设好，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这一回，我虽然报了名，却因病没有被批准参加支农小分队。但为了表达一个城市青年工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战友们的革命情谊，我托小分队的同志们

带了一套《列宁选集》和一些锄头、刨子，赠给你们。请收下这份心意吧。致以革命的敬礼

上海竹木公司仓库工人 潘瑞荣

第二封

亲爱的战友：

此刻已是夜晚，你能想象得到山区的夜是一个多么生动和喧腾的世界吗？我们正在朗朗的月光下，朗诵着你那感人肺腑的来信，你信中的每一句话都拨动着我们的弦，不少同志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我们衷心祝你早日恢复健康，有机会到江西山区来踩一踩当年红军的脚印，这是比什么都要幸福的。

我们在这里听过一个跟随毛主席革命的老红军讲的深山开路的故事。在人迹罕至、飞鸟不临的深山里，只有陡削的悬崖绝壁，遍是荆棘的幽谷荒原，根本没有路。我们的红军先头部队，硬是在这里用生命和鲜血铺出了一条路。今天，我们走在先烈们铺筑的革命路上，分外自豪。我们决不留恋上海平坦宽阔的柏油大道，宁愿在蜿蜒曲折的高山险路上攀登。你送来的礼物是革命的礼物，比什么都珍贵。我们一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用锄头敲响帝修反的丧钟，用刨子刨掉修正主义的黑根。毛主席为我们指明了上山下乡的光辉道路，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底。致以

革命的敬礼

峡江县马埠公社曾安青年队全体队员

这两封普通的革命青年之间的书信，使人读了久久不能平静。它使我们想起一次又一次地在车站、码头欢送战友的情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有多少上海知识青年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光辉道路！

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城市的党组织和工人阶级并没有忘记他们。《灵壁夜谈》里讲了上海赴安徽上山下乡慰问团的故事，这里要讲的，则是上海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的故事。

一九七五年秋天，上海竹木公司的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走上了去江西山区的路。他们翻山越岭，渡江涉水，从赣南地区到井冈山地区，行走千里，把上海党组织和工人阶级的关怀，送到了有上海知识青年的村村寨寨。

我们随着这支支农小分队，来到了林木挺秀的赣南山区，记下了在第一个支农点——定南县新城公社铁炉青年林场的所见所闻。

铁炉，从前没有路。

从铁炉到定南县城，不过三四十里的路程。可是，参差错落的大小山峰横亘其间，铁炉的人们要进城一趟可真难啦！铁炉没有路，人们只好叹息：

铁炉山峰高，满山都是宝。高山挡了路，宝也变成草。

铁炉有了路，还是一九五八年的事。那时，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浪潮，冲进了这个原始森林中的山村。铁炉的几十户贫下中农，一锄一锄地挖山，一箩一筐地挑土，披荆斩

棘开出的路一尺一尺地往前伸延，终于从铁炉通向了县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上海知识青年满怀“双手绣出地球红”的革命豪情，踏着这条山间小路来到了铁炉。然而，初到铁炉的上海知识青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行路难。

上海知识青年来铁炉，是决心大有作为地干一番事业的。但是铁炉的路太窄，却明显地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里大量的木材要靠人们用肩膀扛着从这条山间小路上运出去，大量的山货要靠人们用手推车推着运出去。要开发山区，要加快建设山区，人们怎么能够容忍在崎岖山路上的蹒跚小步呢？铁炉啊！铁炉！要是有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有多好，要是能在这里办起木材制品加工厂有多好。改造铁炉的规划正在酝酿，这消息象旋风一样地在铁炉内外迅速传开了。

上海竹木公司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来了！他们背着工具箱，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来到了铁炉。可是他们带来的机器，却因路窄运不进铁炉。于是，铁炉的知识青年焦急了，贫下中农焦急了。上海工人阶级已经把机器送到了门口，难道能够因为路窄不让它进铁炉吗？

亲爱的读者，你也许还不知道铁炉这个地名的来历吧！据传说，在很远很远的年代，这片杂树丛生的山林中发现过铁。可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没有见过铁。铁炉，就因为人们日夜想铁才取了这个名字。铁炉的人们想钢铁，想机器，不知想了多少个年头！铁炉的人们想办工厂，想农业机械化——在他们的心中，有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宽广大道。

“从铁炉修出一条公路来！”这是铁炉的贫下中农和上海知识青年的共同愿望。七八十岁的老人争着要多铲几锹土，七八岁的小孩抢着要多搬几块石头，上海知识青年成了开路的突击队，支农小分队的队员们，也积极投入了开拓山路的紧张战斗。

铁炉终于有了一条山间大道。它依着山势盘旋，穿织在多姿的群山之间。正是这条新开的大路，把城乡联结起来，把一代新工人和一代新农民的事业和理想联结起来。“工农路，工农铺”，这条山间大道不正是新型的工农联盟的缩影吗？

在铁炉，一条有形的路由狭窄变得宽广，另一条无形的路，也在人们的思想中开阔起来。这里传开的两个故事，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献 砖 献 瓦

上海竹木公司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一进山，就着手帮助知识青年开办木制品加工厂。厂房将要落成的时候，盖屋顶的几万块瓦还没有哩！

几万块瓦片算得了什么稀奇？不。在铁炉，那的确是稀奇得很。当地造房子，一般都用木板、树皮盖屋顶。有数几家人家的瓦屋，那瓦片都是不惜重金请外乡人来烧的。家里有瓦的，也当作珍宝一样收藏，决计不肯轻易用掉。“生产靠集体，造屋靠自己”，这反映了走上了集体化的农村还保留了一根不大不小的私有制尾巴。

夜深了，在铁炉林场老场长的办公室里，灯光还亮着。大队赤脚医生涂日旺，手里捧着一叠瓦片闯了进来。他说：“上海工人送来了机器，知识青年要办工厂，造厂房要瓦怎么不开个群众大会说一说呢？收下我送来的瓦片吧！”老场长楞住了。涂日旺，已经是三十

七八岁的人了，他还没结婚。按照晚婚的年龄，并不算大，但在当地农村，却算是很迟的了。涂日旺经过多年的积累，好不容易凑起了两万多块瓦，就是准备造新房结婚用的。

老场长疑惑地问：“阿旺，你不准备结婚啦？”

涂日旺一本正经地回答：“结婚再推迟几年算得了啥，先把工厂办起来要紧呀！”

涂日旺主动献出一万二千块瓦，这件事在人们思想中激起了一阵阵波澜，大家议论着，赞扬着，很快就传遍了近山远山。

涂庭周家里有一万块瓦，亲戚朋友多次向他借，都没有答应过。现在，他全部献了出来。一千块，三千块，五千块，从各家各户献了出来。

盖厂房的砖瓦终于解决了。从这里，我们不是清楚地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在同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的道路上迈动的急速步伐吗？

女同志上屋顶

建造木材加工厂，是铁炉最大的一个土木工程。因此，盖屋顶的时候，人们总是特别小心。由于剥削阶级旧意识的毒害，当地有个习惯：妇女不准进香菇房，更不准爬屋顶。据说，女人进了香菇房，香菇也不香；女人上屋顶，倒坍不留情。女知识青年挑着瓦片上踏板，就有好多人焦急地劝阻。支农小分队的女同志忍不住了，这不是孔老二歧视妇女的一套在作怪吗？那天，小潘和小邱这两位青年女工，看到屋顶上人手紧张，也跟着上屋顶帮忙。这一下可不得了。有的人大惊小怪地嚷嚷：“上海阿拉妈（当地方言，即上海女同志）爬屋顶了，屋要坍了，财气要冲了！”

事有凑巧。第二天早晨，新盖的屋顶果然歪歪斜斜，好象就要坍了。其实呢？是因为知识青年缺乏造屋的经验，盖人字形屋顶时没有注意平衡，房梁向左倾斜了十几公分。这件事，引得说闲话的人多了起来。有人甚至说：“房子中了邪，要倒大霉了。”还有一些好心的人，劝她们赶快买烛买纸，烧香辟邪。

支农小分队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要战胜旧习惯势力的挑战，必须拿出事实说服人。他们虚心地请教了当地有经验的泥木工，找到了纠偏的方法。倾斜的房梁被纠正了。许多人翘起大拇指说：“阿拉妈真不简单！她们可是有本事的人啦！”当地的女同志也窃窃私议：“上海阿拉妈能上屋顶，我们为什么不能？偏要上！”她们也一起参加了屋顶竣工的战斗。厂房落成了。小分队的女战士，女知识青年，当地的农村妇女，高高屹立在群山环抱中的新屋顶上，她们无疑是山村的佼佼者。

铁炉有了第一台机器，有了第一座工厂。知识青年不等发动机安装好，就用手转着圆盘锯的转盘，锯起那粗壮的木头，他们迫不及待地外面弄来了有关柴油机的技术资料。

铁炉的人们急切地要求掌握技术，是有很深的理由的。在这偏僻的山村，人们吃够了所谓“黑机手”的苦头。有一些人利用山村人的不懂工业，不懂技术，自称为“工程师”“万能技术员”，招摇撞骗，敲竹杠。去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林场的轧米机坏了，没有人能修理。两个知识青年赶了几十里山路，到外面请人修。对方提出的条件是：修理费按时计

算,每小时七元,外加路费和烟酒费。你看气人不气人!

小分队听到这件事,都很气愤。他们想,我们支农,就是要支援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允许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那么神气活现。于是,他们不分白天和黑夜,帮助贫下中农修机器,帮助知识青年学技术。小分队带着知识青年穿山越岭,修这修那,不收贫下中农一分钱,不抽贫下中农一支烟,受到了大家由衷的称赞。

山村里终于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铁炉的人们第一次看到,根根粗壮的木头,瞬息之间变成了各种形状的半制品。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决心以新的深度和广度向山林进军。

巍巍挺拔的山林啊!你沉睡了多少年,今天才有了大展鸿图的机会。绿色的金子啊!你过去就象埋藏在泥土中的明珠,今天终于大放光彩。

离开铁炉的时候,我们沿着新开的山间大道前进,踏上了去井冈山地区的征途。

我们走在这一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的道路上,又想到了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也是由无到有、由小到大,越走越宽广。

请看一看井冈山地区峡江县马埠公社曾安青年队的创业史吧。

那是一九六九年六月,马埠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山洪。山洪啊,咆哮如雷,卷走了房屋和树木,赶走了这里的十几户农民。留下的,只是满目荒凉的沙地。

就在这时,来了一批年轻的拓荒者——十八名上海知识青年。堆堆乱石,丛丛野草,就在这里创业?于是,有的人心凉了,有的人动摇了,有的准备远走高飞。十八个人中,有六个“铁杆扎根派”坚持了下来,他们就成了曾安青年队的创始人。

六个上海知识青年就在这里近百亩荒滩谷地上开始了创业的战斗。当尖嘴的布谷鸟在山前一叫,他们进行了第一次播种。稻禾会不会抽穗结谷呢?谁不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在创业的道路上,迈开第一步是艰难的,也是鼓舞人心的。曾安青年队的第一个年头,夺得了粮食亩产五百七十五斤的好收成。他们的事业令人羡慕。第二年,曾安青年队就扩大到十九人。

从十八人到六人,又从六人到十九人,反映了创业道路的艰难曲折。是啊!青年队的人,哪一个不有一番颇不平常的经历。

先说说肖银根吧。他是初到荒滩的十八人之一。他长着一块好身板,个子高,力气大,是满怀雄心壮志来青年队的。在青年队虎着劲干了一阵子以后,忽然传来了养路段招工的消息,那里是吃商品粮,每月拿三十几元工资。凭着他那牛犊般的身子,到养路段是块好料子。小肖的心情矛盾极了,是留青年队,还是去养路段?有天晚上,他向青年队队长胡南榆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小胡思考了将近半个小时,然后恳切地回答说:“小肖,你如果打定了主意要走,你就去吧。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我们总是在等着你的。”

小肖到了养路段,心里却不时怀恋青年队的战友。青年队在坚持战斗,青年队在前进;用土灰改造了冷浸田,垦复了油茶山,新建了茶叶林,扩大了一百多亩农田。这一切传到小肖的耳里,内心就要激起一朵朵浪花。有一回,小肖趁假日休息,悄悄地溜回青年队看看。这里火热的战斗生活,强烈地感染了他。以后,每听到青年队传来了喜讯,他和战

友们一样欢快；每听到有人说青年队的怪话，他会第一个站出来反驳。但是，他还是下不了决心——再回青年队。就这样，一年过去了，二年过去了，小肖一直处在矛盾、彷徨中——“养路段还是青年队？拿工资还是挣工分？”

青年队长小胡是个特别细心的人。小肖虽然走了，但一直没有忘记小肖。就象小肖经常打听青年队的情况一样，小胡也经常在了解小肖的情况。小肖的苦闷和彷徨，动摇和反复，小胡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当小肖的心再一次向青年队贴近的时候，小胡主动去找他了。关于小胡、小肖的这次会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在小肖从养路段回家的路上，有的说是在小胡去公社开会的路上。就是小胡、小肖两人的说法也不一样。反正有一点是两人都承认的：他们推心置腹地谈了好几个钟头。

小肖重新回到了曾安青年队。青年队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开了个热烈的欢迎会。小肖在欢迎会上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他真正开始理解了马克思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让我们再认识一下另一位女青年吧。她叫何凌云，那被山风吹紫了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若不是戴了一副眼镜，那模样同当地老倌很难区别。提起这位上海姑娘，人们就会引出她的一大串故事来。

小何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一九六八年，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了井冈山地区马埠公社芦溪生产队务农。经过六个年头风风雨雨的磨炼，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进步很快，当了生产队副队长兼会计。曾安青年队扩充的消息传到了芦溪，引起了小何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所在的芦溪是个富队，收入高。在年终分配时，小何除了生活自给，还结余了二百多元。但她想到，象自己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更需要到最艰苦的环境中去改造。于是，小何主动申请要参加曾安青年队。

生活的道路很不平坦。小何刚刚决定来青年队，就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中说，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她在城里某工厂找到了一个称心的工作。一切手续均已办妥，良机万万不可失去。信中还嘱咐她立即拍一份电报，上面只须写上，“来”，或者“不来”。

赣江的流水日夜奔腾不息，小何的心潮起伏翻滚。小何在煤油灯下翻开了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字一句，都象重锤敲击着小何的心。她抬头看窗外，星星亮闪闪地挂在浅灰色的天幕上，星星在移动，星星在眨着眼睛，好象是在催促着小何去青年队。天上的星星你等一等，让小何沉思一下吧！几年前，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象春风催发了万树芭蕾，开出满天红花。这花，开在广大知识青年的心里，也开在许许多多革命家长的心里。可是，小何要踏上上山下乡的征途，来自家庭的阻力却并不小。然而，毛主席的指示，学校党支部、工宣队的帮助，给了小何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她终于走上了去江西山区的路。几年过去了，家里还在把她往城里拉。她顿时感到，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可真不小。想呀，想呀，小何心里集

结了一个念头：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走什么样的道路却完全可以选择。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立即向家里发去了电报，就是两个字：“不来”。

曾安青年队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扩大。动摇的，坚定起来了。掉过队的，赶上了前进中的队伍。已经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夫妻双双进青年队来了。当地县委副书记亲自把女儿送进青年队来了。

曾安青年队，这个在荒滩上建立起来的战斗集体，结集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理想和心愿。当我们离开曾安的时候，又一个挑着行李的年青人迎面走了过来。好，加上她，这里就有了整整六十名青年。

从赣南地区的铁炉林场到井冈山地区的曾安青年队，在那漫长的山区道路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知识青年的动人事迹。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迈动着雄伟的步伐，前进在反修防修的革命道路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需要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和扶植。因此，让我们在这里讲一讲支农小分队本身吧！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上山记》，它生动地记录了一名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队员在学农、支农道路上的一段不平常的经历——

上山已经五天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五天。

寨乐峰，我生来还是第一次登上这样高的山峰。走进山林，真好象掉进一片竹子的海洋。一不小心，就会被竹尖刺破了脸颊和手脚。最艰苦的还不是爬山，拉竹子，而是要算烧竹沥水了。

竹沥水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把一段一段的竹子放在火灶上烧，竹水就会从两头一点一点滴下来。待到竹子烧焦时，就用手把它抽掉。灶头的火直往上窜，手一碰就得缩了回来。开始，我戴着手套抽焦竹，可是一位知识青年说：“真可惜，好不容易烧出来的竹沥水都给手套吸掉了。”我看到知识青年直接用手去抽那滚烫的竹子，脸红了，赶快也去了手套。灶头上窜火，竹子两端冒烟，呛得人实在难受，眼泪、鼻涕都流下来了。怎么知识青年都不流泪呢？这时，小胡风趣地说：“我们以前天天这样流泪，泪水干了，再也流不出来了。”我内心感动极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可真是一个锻炼人的熔炉啊！

上寨乐峰的五天，是我向农村知识青年学习的五天。在我快要满师的时候，这学农、支农不是补上了极重要的一课吗？ 支农小分队队员 沈伟勇

这篇《上山记》告诉我们，学农、支农的道路，是千千万万城市青年工人应当走的道路。走这条道路，也同样是艰难曲折的，是会充满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竹木公司支农小分队，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这里都不一一叙述了。唯有小分队里的小李“支农不支妹”的故

事，还得讲一讲。

小分队从上海出发之前，第一个支农点本来是设在铁炉附近的大云田林场。小李的妹妹就在那里插队。当时，有些人对小李说：“这一回，你妹妹准得上调进工厂了！”这话立即引起了小李的警惕。他在日记中写上了这样的话：

我要牢记支农小分队的使命。我们去江西山区是干什么的？是去做巩固上山下乡成果的工作的，决不是去拆上山下乡的台的。怎么能拿上海党组织和工人阶级对知识青年的关怀去进行可耻的私人交易呢？支农不是支妹啊！

到了定南县，根据县委的意见，第一个支农点不是大云田，而是铁炉。铁炉和大云田只隔着一座山，小李忙着小分队的工作，他没有去。

小李即将离开铁炉去井冈山地区了，同志们劝他去看一看妹妹。这时，小李仿佛感到，大家要他去大云田看的并不只是一个妹妹，而是几十名知识青年。他想：“我的妹妹怎么样呢？是不是在和广大知识青年一起前进呢？”他怀着一种鼓励妹妹扎根山区、坚持乡村的责任感，在离开铁炉的最后一个夜晚，来到了大云田。

大云田的夜晚美丽极了，公社正在这里开大会讨论农业学大寨的规划。知识青年业余文艺宣传队正在排演节目，小李的妹妹就在歌舞丛中。那一夜，大云田知识青年的宿舍里，就象白天一样喧闹。小李同妹妹谈了一阵，然后，兄妹俩又挨家挨户去看望其他的知识青年。小李到大云田，是代表了上海工人阶级对知识青年的关心啊！在小李离开大云田的时候，我们只听见一个声音在山间回响：“小妹，向大家学习，上山下乡不动摇，沿着这条金光大道走到底！”

小李离开了大云田，“支农不支妹”的故事却永远留在大云田。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没有停步，上海青年工人在支农、学农的道路上也同样没有停步。你看，在江西山区的道路上，在凡是有知识青年的地方，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闪耀着动人的光辉。

上海机床公司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

上海拖汽公司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

上海建工局青年工人支农小分队！

.....

这一面面红旗，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红旗，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红旗，是反修防修、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旗。这一面面红旗，都是从当年红军的手里接过来的，更加夺目更加红。

前进吧！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宽广无比。这是一条知识青年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这是一条缩小以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的光辉之路；这是一条限制以至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战斗之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人们，头上有毛主席的灿烂阳光暖照，到处都有对你们的赞扬和支持。

胜利一定属于坚持革命的人们！



◆
一 九 七 六 年

◆
第 六 期

◆
总 第 三 十 四 期
◆

XUEXI YU PI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代号: 4-192

定价: 0.25元